

传世名著百部之 人物志 政训 康熙政要

名著通览

《人物志》是我国一部辨析、评论人物的专著。刘邵撰述。约成书于曹魏明帝统治时期（227—239）。作者在自序中阐述撰著目的：“夫圣贤之所美，莫美乎聪明，聪明之所贵，莫贵乎知人，知人诚智，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。”魏时文帝曹丕接受陈群建议，用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材。该书即是在推行九品中正品评人物、选择人材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专著，旨在为推行九品中正制在理论上提供依据，在实践上总结经验，以推动这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。十六国时刘昺为之作注，重在“疏通大义，不沾沾于训诂，文词简括”。其后流传既久，传本颇多谬误。明万历甲申（1584）河间刘用霖用隆庆壬申（1572）本旧版合官私书校之，去其重复，成为定本。今有《汉魏丛书本》、《明万历刘氏刊本》、《四库全书本》、《四部丛刊本》等。其书自《隋唐·经籍志》以后皆列于名家，《四库全书》则归入子部、杂家类一。

刘邵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孔才，邯郸（今河北邯郸市）人。魏建安中为计吏。黄初中为尚书郎、散骑侍郎。明帝太和初，出为陈留太守，征拜骑都尉。正始中执经讲学，赐爵关内侯。卒，追赠光禄勋。刘邵学问渊博，通天文、律令，文学也有高深造诣。著作除《人物志》外，“集五经群书，以类相从，作《皇览》，与议郎庾嶷、荀诜等定科令，作新律，著《律略论》，受诏作《都官考课》七十二条，又作《说略》、《乐论》，《法论》等书。并作《赵都赋》、《许赋》、《洛都赋》等，皆寓讽谏之意，有一定文学价值。

《人物志》分上、中、下3卷，12篇。上卷包括九征，体别，流业，材理；中卷包括材能，利害，接识，英雄，八观。下卷包括七缪，效难，释争。以《九征》“禀阴阳以立性，体五行而著形”为纲，对人的形质、才性、才能、资质以及如何辨析、任用等问题开展详尽的论述。

《人物志》每篇讲一个问题。首先讲《九征》。他认为人物的性情由于人的禀气不同，从形态展示，共有九种。其中以中和之质为最贵。“凡人之质量，中和最贵美。中和之质，必平淡无味。……是故观人察质，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。”他把儒家中庸之道作为观察人的最高道德标准，并以此来定评人物。第二讲《体别》。他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，有不同的优点和不足，用人者要知其所长，明其所短。并由此分析了十二种人的性格和优缺点。第三讲流业。他认为人的流品大略有十二种，据其不同，可以任命他们担任各自不同的职务。如法家，立宪垂则，可以任司寇。口辩家，应对给捷，可以任外交。第四讲《材理》。他认为人的材质既不同，理智也不同。应加鉴别：理有四部，明有四家，情有九偏，流有七似，说有三失，难有六构，通有八能。第五讲材能。他认为人的材能有大小，应量其力而任其职，才能人尽其能，收到良好的效果。如宽宏的人，可以任郡国守、相。如国君以用人能为能，能听话为能，能行赏罚为能；臣子以承担本职工作为能，能说话为能，能行动为能。第六讲利害。他认为除清节家外，其他各家都有利弊，利于国家，害及自身。如“法家之业，本于制度，待乎成功而效，其道前苦而后治，严而为众。故其未达也，为众人所忌，已试也，为上下之所惮。其功足以立法成治，其弊也为群枉之所仇。其为业也，有敝而不常用，故功大而不终。”第七讲接识。他认为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，二流之人能

识二流之美，尽有诸流，则亦能兼达众材。第八讲英雄。他认为“聪明秀出谓之英，胆力过人谓之雄”。“徒英而不雄，则雄才不服也；徒雄而不英，则智者不归信也。故雄能得雄，不能得英；英能得英，不能得雄。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，乃能役英与雄，故能成大业也。”第九讲八观。他认为人们的才智各异，考察他们有八种方法。“一曰观其救夺，以明间杂；二曰观其感变，以审常度；三曰观其志质，以知其名；四曰观其所由，以辨依似；五曰观其爱敬，以知通塞；六曰观其情机，以辨怨惑；七曰观其所知，以知其长；八曰观其聪明，以知所达。”他认为对各种人物要仔细辨析，有时似是而非，如“直而讦者偏也。”有时似非而是，如“大权如奸而有功，大智如愚而内明。”第十讲七缪。他认为对人物的考察是极其复杂的，往往出现七方面的谬误。“一曰察誉而偏颇之缪；二曰接物有恶之惑；三曰度心有大小之误；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；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；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；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。第十一讲效难。他认为知人的效能有二难。有难知之难，有知之而无由得效之难。为什么无由得效呢？原因是多方面的，“上材已莫知，或所识者在幼贱之中未达而丧，或曲高和寡，或身卑力微，言不见亮。”他慨叹说：“须识真在位，百不一有也。”第十二讲释争。他认为争则两败俱伤，和则两利。他举例说：“并辔争先而不能相夺，两顿俱折，而为后者所趋。”他教育人们，“知屈之可以为伸，故含辱而不辞，知早让之可以胜敌，故下之而不疑，及其终极乃转祸而为福，屈仇而为友，使怨仇不延于后嗣，而美名宣于无穷。”

《人物论》以儒家的中庸思想作指导，用两点论的方法从正反、利弊、优劣、得失诸方面细致地剖析人物，在当时为推进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材，开启魏晋士大夫品鉴人物的清谈之风有一定作用；对后世如何观察甄定人物，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。

全文及大意

《人物志》序

阮逸撰

人性为之原，而情者性之流也。性发于内，情导于外，而形色随之。故邪正态度，变露莫状，溷而莫睹其真也。惟至哲为能以材观情、索性、寻流、照原，而善恶之迹判矣。圣人没，诸子之言性者各胶一见，以倡惑于后，是俾驰辨斗异者得肆其说，蔓延天下。故学者莫要其归，而天理几乎熄矣。予好阅古书，于史部中得刘邵人物志十二篇，极数万言。其述性品之上下，材质之兼偏，研幽摘微，一贯于道，若度之长短，权之轻重，无铢发蔽也。大抵考诸行事，而约人于中庸之域，诚一家之善志也。由魏至宋历数百载，其用尚晦而鲜有知者。吁！可惜哉。矧虫篆浅技，无益于教者犹刊镂以行于世，是书也，博而畅，辨而不肆，非众说之流也。王者得之，为知人之龟鉴；士君子得之，为治性修身之桢栝，其效不为小矣。予安得不序而传之。媿夫良金美玉，簠簋一启，而观者必知其宝也。

《人物志》自序

【魏】刘邵撰

【凉】刘昉注

夫圣贤之所美，莫美乎聪明。天以三光著其象，人以聪明邵其度。聪明之所贵，莫贵乎知人。聪于书计者，六艺之一术。明于人物者，官材之总司。知人诚智，则众材得其序，而庶绩之业兴矣。是以圣人著爻象，则立君子小人之辞。君子者，小人之师。小人者，君子之资。师资相成，其来尚矣。叙诗志，则别风俗雅正之业。九土殊风，五方异俗，是以圣人立其教不易其方，制其政不改其俗。制礼乐，则考六艺祗庸之德。虽不易其方，常以诗礼为首，虽不改其俗，常以孝友为本。躬南面，则援俊逸辅相之材。皆所以达众善，而成天功也。继天成物，其任至重，故求贤举善，常若不及。天功既成，则并受名誉。忠臣竭力而效能，明君得贤而高枕，上下忠爱，谤毁何从生哉。是以尧以克明俊德为称；舜以登庸二八为功；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；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。由此论之，圣人兴德，孰不劳聪明于求人，获安逸于任使者哉。采士饭牛，秦穆所以霸西戎，一则仲父，齐桓所以成九合。是故仲尼不试，无所援升，犹序门人以为四科，泛论众材以辨三等。举德行为四科之首，叙生知为三等之上，明德行者道义之门，质志气者材智之根也。又叹中庸，以殊圣人之德。中庸之德其至矣乎，人鲜久矣，唯圣人能之也。尚德以劝庶几之论。颜氏之子，其殆庶几乎，三月不违仁，乃窥德行之门。若非志士仁人，希迈之性，日月至焉者，岂能终之。训六蔽，以戒偏材之失。仁者爱物，蔽在无断。信者露诚，蔽在无隐，此偏材之常失也。思狂狷，以通拘抗之材。或进趋于道义，或洁已而无为，在上者两顺其所能，则拘抗并用。疾矜矜而无信，以明为似之难保。厚貌深情，圣人难之，听其言而观其所为，则似托不得逃矣。又曰察其所安，观其所由，以知居止之行。言必契始以要终，行必睹初以求卒，则中外之情粗可观矣。人物之察也，如此其祥。不祥察则官材失其序，而庶政之业荒矣。是以敢依圣训，志序人物，庶以补缀遗忘，惟博识君子裁览其义焉。

卷上

九徵第一

人物情性志气不同，徵神见貌，形验有九。

盖人物之本，出乎情性。性质稟之自然，情变由于染习。是以观人察物，当寻其性质也。情性之理，甚微而玄，非圣人之察，其孰能究之哉？知无形状，故常人不能睹，惟圣人目击而照之。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含元一以为质，质不至则不能涉寒暑，历四时。稟阴阳以立性，性资于阴阳，故刚柔之意别矣。体五行而著形。骨劲筋柔，皆稟精于金木。苟有形质，犹可即而求之。由气色外著，故相者得其情素也。

凡人之质量，中和最贵矣。质白受采，味甘受和，中和者百行之根本，人情之良田也。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，惟淡也故五味得和焉，若苦则不能甘矣，若酸也则不能咸矣。故能调成五材，变化应节。平淡无偏，群材必御，致用有宜，通变无滞。是故观人察质，必先察其平淡，而后求其聪明。譬之驥騄，虽超逸绝群，若气性不和，必有毁衡碎首决胸之祸也。聪明者，阴阳之精。离目、坎耳，视听之所由也。阴阳清和，则中睿外明。圣人淳耀，能兼二美。知微知章，耳目监察，通幽达微，官材授方，举无遗失。自非圣人莫能两遂。虽得之于目，或失之于耳。故明白之士，达动之机，而暗于玄虑。达于进趋而暗于止静，以之进趋，则欲速而成疾，以之深虑，则抗夺而不入也。玄虑之人，识静之原，而困于速捷。性安沉默，而智乏应机。以之闲静，则玄微之道构，以之济世，则劲捷而无成。犹火日外照，不能内见；金水内映，不能外光。人各有能，物各有性，是以圣人任明白以进趋，委守成于玄虑，然后动止得节，出处应宜矣。二者之义，盖阴阳之别也。阳动阴静，乃天地之定性，况人物乎。若量其材质，稽诸五物。五物之徵，亦各著于厥体矣。筋勇色青，血勇色赤，中动外形，岂可匿也。

其在体也，木骨、金筋、火气、土肌、水血，五物之象也。五性者，成形之具。五物为母，故气色从之而具。五物之实，各有所济。五性不同，各有所稟，稟性多者则偏性生也。是故骨植而柔者，谓之弘毅。弘毅也者，仁之质也。木则垂荫，为仁之质。质不弘毅，不能成仁。气清而朗者，谓之文理。文理也者，礼之本也。火则照察，为礼之本。本无文理，不能成礼。体端而实者，谓之贞固。贞固也者，信之基也。土必吐生，为信之基也。基不贞固，不能成信。筋劲而精者，谓之勇敢。勇敢也者，义之决也。金能断割，为义之决。决不勇敢，不能成义。色平而畅者，谓之通微。通微也者，智之原也。水流疏达，为智之原。原不通微，不能成智。五质恒性，故谓之五常矣。五物，天地之常气。五德，人物之常行。

五常之别，列为五德。是故温直而扰毅，木之德也。温而不直则懦，扰而不毅则判。刚塞而弘毅，金之德也。刚而不塞则决，弘而不毅则缺。愿恭而理敬，水之德也。愿而不恭则悖，理而不敬则乱。宽栗而柔立，土之德也。宽而不栗则慢，柔而不立则散。简畅而明矻，火之德也。简而不畅则滞，明而不矻则翳。虽体变无穷，犹依乎五质。人情万化，不可胜极，寻常竟源，常在于五。

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徵，著乎形容，见乎声色，发乎情味，各如其象。自然之理，神动形色，诚发于中，德辉外耀。故心质亮直，其仪劲固。心质

休决，其仪进猛。心质平理，其仪安闲。夫仪动成容，各有态度。直容之动，矫矫行行。休容之动，业业跲跲。德容之动，颀颀印印。

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，心气于内，容见于外。心气之徵，则声变是也。心不系一，声和乃变。夫气合成声，声应律吕。清而亮者律，和而平者吕。有和平之声，有清畅之声，有回衍之声。心气不同，故声发亦异也。夫声畅于气，则实存貌色。非气无以成声，声成则貌应。故诚仁，必有温柔之色。诚勇，必有矜奋之色。诚智，必有明达之色。声既殊管，故色亦异状。夫色见于貌，所谓徵神。貌色徐疾，为神之徵验。徵神见貌，则情发于目。目为心候，故应心而发。故仁，目之精，晬然以端。心不倾倚，则视不回邪。勇，胆之精，晬然以强。志不怯懦，则视不衰悴。然皆偏至之材，以胜体为质者也。未能不厉而威，不怒而严。故胜质不精，则其事不遂，能勇而不能怯，动必悔吝随之。是故直而不柔，则木。木强激讦，失其正直。劲而不精，则力。负鼎绝脰，失其正劲。固而不端，则愚。专己自是，陷于愚戆。气而不清，则越。辞不清顺，发越无成。畅而不平，则荡。好智无涯，荡然失绝。是故中庸之质，异于此类。勇而能怯，仁而能决，其体两兼，故为众材之主。五常既备，包以澹味。既体咸酸之量，而以无味为御。五质内充，五精外章。五质澹凝，淳耀外丽。是以目彩五晖之光也。心清目朗，粲然自耀。故曰，物生有形，形有神精，不问贤愚，皆受气质之稟性阴阳，但智有精粗，形有浅深耳。寻其精色，视其仪象，下至皂隶牧圉，皆可想而得之也。能知精神，则穷理尽性。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拟诸形容，故能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。

性之所尽，九质之徵也。阴阳相生，数不过九，故性情之变，质亦同之。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。神者质之主也，故神平则质平，神陂则质陂。明暗之实在于精。精者实之本，故精惠则实明，精浊则实暗。勇怯之势在于筋。筋者势之用，故筋劲则势勇，筋弱则势怯。强弱之植在于骨。骨者植之基，故骨刚则植强，骨柔则植弱。躁静之决在于气。气者决之地也，气盛决于躁，气冲决于静矣。惨怛之情在于色。色者情之候也，故色悴由情惨，色悦由情怛。衰正之形在于仪。仪者形之表也，故仪衰由形殆，仪正由形肃。态度之动在于容。容者动之符也，故 薰动则容态，正动则容度。缓急之状在于言。言者心之状也，故心恕则言缓，心褊则言急。其为人也，质素平澹，中睿外朗，筋劲植固，声清色怛，仪正容直，则九徵皆至，则纯粹之德也。非至德大人，其孰能与于此。九徵有违，违，为乖戾也。则偏杂之材也。或声清色怛，而质不平淡。或筋劲植固，而仪不崇直。三度不同，其德异称。偏材荷一至之名，兼材居德仪之目，兼德体中庸之度。故偏至之材，以材自名。犹百工众伎，各有其名也。兼材之人，以德为目。仁义礼智，得其一目。兼德之人，更为美号。道不可以一体说，德不可以一方待，育物而不为仁，齐众形而不为德，凝然平淡，与物无际，谁知其名也。是故兼德而至，谓之中庸。居中履常，故谓之中庸。中庸也者，圣人之目也。大仁不可亲，大义不可报，无德而称，寄名于圣人也。具体而微，谓之德行。德行也者，大雅之称也。施仁以亲物，直义以利仁，失道而成德，抑亦其次也。一至谓之偏材。偏材，小雅之质也。徒仁而无义，徒义而无仁，未能兼济，各守一行，是以名不及大雅也。一徵谓之依似。依似，乱德之类也。绝讦似直而非直，纯宕似通而非通。一至一违，谓之间杂。间杂，无恒之人也。善恶参浑，心无定是。无恒之操，胡可拟议。无恒、依似，皆风人末流。其心孔艰者，乃有教化之所不受也。末流之质，不可胜论，是以略而不概也。蕃徒成群，岂可数哉。

【大意】

人物的本质，出于性情，关于性情的道理，非常微妙，如果没有圣人的洞察力，常人谁能探究清楚呢？凡是有血气的生命，无不包含天地混沌元气为其本质，秉承阴阳两面以树立根性、容纳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元素形成形体。如果具备形貌气质，就可以探究其本性。凡是人的素质，以中正平和为最可贵。中和的素质必然平淡无味，也因此能使人体内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材谐调，变化无碍而又顺应客观规律。因此观察一个人的素质，一定先看他是否平淡，然后再看他是否聪明。所谓聪明，是天地阴阳的精华。阴阳之气协调清和，就内有睿智，外能通达。圣人淳朴于内而聪明于外，能够兼具平淡与聪明之美。

如果衡量一个人的才能资质，可用五行的道理去考核，五行的征象也各体现在人的体质。

人体所具备的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物征，各有所成就的方面。因此骨骼坚直而柔韧，就叫弘大刚毅；弘大刚毅是“仁”的本质；气质清新而明朗，叫典文仪节，典文仪节是“礼”的根单；体性端正而结实，叫坚贞不移，它是“信”的基础；筋腱强劲而精健，叫勇武果敢，它是“义”的决断；血色平和而通畅，就叫通微知著，它是“智”的来源。由五种体质形成五种恒定的性分，所以称之为“五常”。

人物性情的变化规律，体现在九个方面的征象。平正或偏邪的素质在于神明；聪慧或愚钝的根本在于精气；勇敢或怯懦的气势在于筋脉；强健或纤弱的体魄在于骨骼；急躁或沉静脾性在于气血；悲伤或愉悦的情绪在于面色；衰殆或整肃的形象在于仪表；造作或自然的举止在于容貌；和缓或急切的状态在于言语。为人质性平静淡泊，内心敏慧外表清朗，筋腱强劲骨骼坚挺，声音清润神色悦悻，仪表端庄容貌端正，九种类型的表征都具备，就是材德精美的人材。

如果九种征象相互矛盾，则为编杂之材。细分可为偏材，兼材和兼德。兼德为最高境界，即所谓中庸，唯圣人可称之。

体别第二

禀气阴阳，性有刚柔。拘抗文质，体越各别。

夫中庸之德，其质无名。泛然不系一貌，人无得而称焉。故咸而不碱，谓之咸耶，无碱可容，公成百卤，也与咸同。淡而不醕，味之淡耶，味复不醕。质而不缊，谓之质耶，理不缊素。文而不绩。谓之文耶，采不尽绩。能威能怀，能辨能纳，居咸淡之和，处质文之际，是以望之俨然，即之而文，言满天下无辞费。变化无方，以达为节。应变适化，期于通物。

是以抗者过之，励然抗奋于进趋之途。而拘者不逮。屯然无为于拘抗之外。夫拘抗违中，故善有所章，而理有所失。养形至甚，则虎食其外，高门悬薄，则病攻其内。是故厉直刚毅，材在矫正，失在激讦。讦刺生于刚厉。柔顺安恕，每在宽容，失在少决。多疑生于恕懦。雄悍杰健，任在胆烈，失在多忌。慢法生于桀悍。精良畏慎，善在恭谨，失在多疑。疑难生于畏慎。强楷坚劲，用在桢干，失在专固。专己生于坚劲。论辨理绎，能在释结，失在流宕。傲宕生于机辨。普博周给，弘在覆裕，失在溷浊。溷浊生于周普。清介廉洁，节在俭固，失在拘局。拘局生于廉洁。休动磊落，业在攀跻，失在疏越。疏越生于磊落。沉静机密，精在玄微，失在迟缓。迟缓生于沉静。朴露径尽，质在中诚，失在不微。漏露生于径尽。多智韬情，权在谲略，失在依违。隐违生于韬情。及其进德之日不止，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，抗者自是以奋励，拘者自是以守局。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，拘者愈拘，抗者愈抗，或负石沉躯，或抱木焦死。犹晋楚带剑递相诡反也。自晋视楚，则笑其在左，自楚视晋，则笑其在右，左右虽殊，各以其用，而不达理者，横相诽谤。拘抗相反，皆不异此。

是故强毅之人，狠刚不和。不戒其强之搪突，而以顺为挠，厉其抗。以柔顺为挠弱，抗其搪突之心。是故可以立法，难与入微。狠强刚戾，何机微之能入。柔顺之人，缓心宽断。不戒其事之不摄，而以抗为别，安其舒。以猛抗为别伤，安其恕忍之心。是故可与循常，难与权疑。缓心宽断，何疑事之能权。雄悍之人，气奋勇决。不戒其勇之毁跌，而以顺为恒，竭其势。以顺忍为恒怯，而竭其毁跌之势。是故可与涉难，难与居约。奋悍毁跌，何约之能居。惧慎之人，畏患多忌。不戒其悞于为义，而以勇为狎，增其疑。以勇慧为轻侮，增其疑畏之心。是故可与保全，难与立节。畏患多忌，何节义之能立。凌楷之人，秉意劲特。不戒其情之固护，而以辨为伪，强其专。以辨博为浮虚，而强其专一之心。是故可以持正，难与附众。执意坚持，何人众之能附。辨博之人，论理赡给。不戒其辞之泛滥，而以楷为系，遂其流。以楷正为系碍，而遂其流宕之心。是故可与泛序，难与立约。辨博泛滥，何质约之能立。弘普之人，意爱周洽。不戒其交之溷杂，而以介为狷，广其浊，以拘介为狷戾，而广其溷杂之心。是故可以抚众，难与厉俗。周洽溷杂，何风俗之能厉。狷介之人，砭甫廉反。清激浊。不戒其道之隘狭，而以普为秽，益其拘。以弘普为秽杂，而益其拘局之心，是故可与守节，难以变通。道狭津隘，何通途之能涉。休动之人，志慕超越。不戒其意之大猥，而以静为滞，果其锐。以沉静为滞屈，而增果锐之心。是故可以进趋，难与持后。志在超越，何谦后之能持。沉静之人，道思回复。不戒其静之迟后，而以动为疏，美其悞。以躁动为粗疏，而美其悞弱之心。是故可与深虑，难与捷速。思虑回复，何机速之能及。朴露之人，中疑实韬。不戒其实之野直，而以谲为诞，

露其诚。以权谲为浮诞，而露其诚信之心。是故可与立信，难与消息。实谲野直，何轻重之能量。谲之人，原度取容。不戒其术之离正，而以尽为愚，贵其虚。以欵尽为愚直，而贵其浮虚之心。是故可与赞善，难与矫违。谲离正，何违邪之能矫。夫学，所以成材也。强毅静其抗，柔顺厉其慊。恕，所以推情也。推己之情，通物之性。偏材之性不可移转矣。固守性分，闻义不徙。虽教之以学，材成而随之以失。刚毅之性已成，激讦之心弥笃。虽训之以恕，推情各从其心。意之所非，不肯是之于人。信者逆信，推己之信，谓人皆信，而诈者得容为伪也。诈者逆诈，推己之诈，谓人皆诈，则信者或受其疑也。故学不入道，恕不周物，偏材之人，各是己能，何道之能入，何物能周也。此偏材之益失也。材不能兼，教之愈失。是以宰物者用人之仁去其贪，用人之智去其诈，然后群材毕御，而道周万物也矣。

【大意】

中庸的品德，它的实质不可名状，正像含盐的水虽咸却并不苦涩，虽淡却非索然无味一样，具有中庸品德的人，望之俨然，即之而温，既能辩说无碍，也能缄默不语，变化无穷，唯以通达为关节。

因为不深通中庸之道，人很难在社会中面面俱到，游刃有余。往往在表现出某种才能的同时，也暴露出很大不足，因此难成德材兼备之人。

所以应以“中庸”为准则，戒除抗厉过度或拘谨不及，要知道，指责他人短处，只会使自己的缺点更加突出，于事无补也。

本章分析了十二种“偏材”的特点和得失，以及应该引以为戒的地方。

流业第三

三材为源，习者为流。流渐失源，其业各异。

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。性既不同，染习又异，枝流条别，各有志业。有清节家，行为物范。有法家，立宪垂制。有术家，智虑无方。有国体，三材纯备。有器能，三材而微。有臧否，分别是非。有伎俩，错意工巧。有智意，能铄众疑。有文章，属辞比事。有儒学，道艺深明。有口辨，应对给捷。有雄杰。胆略过人。

若夫德行高妙，容止可法，是谓清节之家，延陵、晏婴是也。建法立制，强国富人，是谓法家，管仲、商鞅是也。思通道化，策谋奇妙，是谓术家，范蠡、张良是也。兼有三材，三材皆备，德与法术皆纯备也。其德足以厉风俗，其法足以正天下，其术足以谋庙胜，是谓国体，伊尹、吕望是也。兼有三材，三材皆微，不纯备也。其德足以率一国，其法足以正乡邑，其术足以权事宜，是谓器能，子产、西门豹是也。兼有三材之别，各有一流。三材为源，则习者为流也。清节之流，不能弘恕，以清为理，何能宽恕。好尚讥诃，分别是非，已不宽恕，则是非生。是谓臧否，子夏之徒是也。法家之流，不能创思远图，法制于近，思不及远。而能受一官之任，错意施巧，务在功成，故巧意生。是谓伎俩，张敞、赵广汉是也。术家之流，不能创制垂则，以术求功，故不垂则。而能遭变用权，权智有馀，公正不足，长于权者，必短于正。是谓智意，陈平、韩安国是也。凡此八业，皆以三材为本。非德无以正法，非法无以兴术，是以八业之建，常以三材为本。故虽波流分别，皆为轻事之材也。耳目殊管，其用同功。群材虽异，成务一致。能属文著述，是谓文章，司马迁、班固是也。能传圣人之业，而不能干事施政，是谓儒学，毛公、贯公是也。辩不入道，而应对资给，是谓口辩，乐毅、曹丘生是也。胆力绝众，材略过人，是谓骁雄，白起、韩信是也。凡此十二材，皆人臣之任也，各抗其材，不能兼备，保守一官，故为人臣之任也。主德不预焉。

主德者，聪明平淡，总达众材，而不以事自任者也。目不求视，耳不参听，各司其官，则众材达。众材既达，则人主垂拱无为而理。是故主道立，则十二材各得其任也。上无为，则下当任也。清节之德，师氏之任也。掌以道德，教道胄子。法家之材，司寇之任也。掌以刑法，禁制奸暴术家之材，三孤之任也，掌以庙谟，佐公论正。三材纯备，三公之任也。位于三槐，坐而论道。三材而微，冢宰之任也。天官之卿，总御百官。臧否之材，师氏之佐也。分别是非，以佐师氏。智意之材，冢宰之佐也。师事制宜，以佐天官。伎俩之材，司空之任也。错意施巧，故掌冬官。儒学之材，安民之任也。掌以德毅，保安其人。文章之材，国史之任也。宪章纪述，垂之后代。辩给之材，行人之任也。掌之应答，送迎道路。骁雄之材，将帅之任也。掌辖师旅，讨平不顺。是谓主道得而臣道序，官不易方，而太平用成。太平之所以成，由官人之不易方。若使足操物，手求行，四体何由宁，理道何由平。若道不平淡，与一材同用好，譬大匠善规，惟规之用。则一材处权，而众材失任矣。惟规之用，则矩不得立其方，绳不得经其直。虽目运规矩，无由成矣。

【大意】

根据人材的类别，可将其职业分为十二种：清节家、法家、术家、国体、器能、臧否、伎俩、智意、文章、儒学、口辩、雄杰。

道德行为高尚美好，仪容举止值得效法的人，称为清节家；建立法制，

强国富民的人，称为法家；思虑通达大道真义，策谋奇妙不凡的人，称为术家；兼有三材，德、法、术齐名，这类人是国家的体面，足以担纲。以下述及其他偏材，及其所能胜任的职业。

人君的材德，当聪明平淡，能使各类人材各司其职，而不是自己担任各种职务。这就是所谓君主之道设立而人臣之道次序井然，各级官员不违背自己的职责，天下太平就成为可能。如果君主之道不能平淡，与偏材一样只用某一方面的才能，那么一材虽然拥有权力，而众材不得其用。

总之，领导者应有知人之明，善用人之长，弃其所短，则事无不成。

材理第四

材既殊途，理亦异趣。故讲群材，至理乃定。

夫建事立义，莫不须理而定。言前定则不惑，事前定则不蹶。及其论难，鲜能定之。夫何故哉？盖理多品而人材异也。事有万端，人情舛驳，谁能定之。夫理多品，则难通。人材异，则情诡。情诡、难通，则理失而事违也。情诡理多，何由而得。夫理有四部，道义事情，各有部也。明有四家明通四部，各有其家。情有九偏，以情犯明，得失有九。流有七似，似是而非，其流有七。说有三失，辞胜理滞，所失者三。难有六构，强良竞气，忿构有六。通有八能。聪思明达，能通者八。

若夫天地气化，盈虚损益，道之理也。以道化人，与时消息。法制正事，事之理也。以法理人，务在宪制。礼教宜适，义之理也。以理教之，进止得宜。人情枢机，情之理也。观物之情，在于言语。

四理不同，其于才也，须明而章，明待质而行。是故质于理合，合而有明，明足见理，理足成家。道义与事，情各有家。是故质性平淡，思心玄微容不躁扰，其心详密。能通自然，道理之家也，以道为理，故能通自然也。质性警彻，权略机捷，容不迟钝，则其心机速。能理烦速，事理之家也。以事为理，故审于理烦也。质性和平，能论礼教，容不失适，则礼教得中。辩其得失，义礼之家也。以义为礼，故明于得失也。质性机解，推情原意，容不妄动，则原物得意。能适其变，情理之家也。以情为理，故能极物之变。

四家之明既异，而有九偏之情。以性犯明，各有得失。明出于真，情动于性，情胜明，则蔽，故虽得而必丧也。刚略之人，不能理微。用意麓粗，意不玄微。故其论大体，则弘博而高远，性刚刚志远。历纤理，则宕往而疏越。志远故疏越。抗厉之人，不能回挠。用意猛兽，志不旋屈。论法直，则括处而公正，性厉则理毅。说变通，则否戾而不入。理毅则滞碍。坚劲之人，好攻其事实。用意端确，言不虚徐。指机理，则颖灼而彻尽，性确则言尽。涉大道，则径露而单持。言切则义少。辩给之人，辞烦而意锐。用意疾急，志不在退挫。推人事，则精识而穷理，性锐则穷理。即大义，则恢愕而不周。理细故遗大。浮沉之人，不能沉思。用意虚廓，志不渊密。序疏数，则豁达而傲博，性浮则志微。立事要，则熿炎而不定。志傲则理疏。浅解之人，不能深难。用意浅晚，思不深熟。听辩说，则拟铎而愉悦，性浅则易悦。审精理，则掉转而无根。易悦故无根。宽恕之人，不能速捷。用意徐缓，思不速疾。论仁义，则弘详而长雅，性恕则理雅。趋时务，则迟缓而不及。徐雅故迟缓。温柔之人，力不休强。用意温润，志不美悦。味道理，则顺适而和畅，性和则理顺。拟疑难，则濡渎而不尽。理顺故依违。好奇之人，横逸而求异。用意奇特，志不同物。造权譎，则倜傥而瓌壮，性奇则尚丽。案清道，则诡常而恢迂。奇逸故恢诡。此所谓性有九偏，各从其心之所可以为理。心之所可以为理，是非相蔽，终无休已。

若乃性不精畅，则流有七似。有漫谈陈说，似有流行者。浮漫流雅，似若可行。有理少多端，似若博意者。辞繁喻博，似若弘广。有回说合意，似若赞解者。外佯称善，内实不知。有处后持长，从众所安，似能听断者。实自无知，如不言，观察众谈，赞其所安。有避难不应，似若有馀，而实不知者。实不能知，忘佯不应，似有所知，而不答者。有慕通口解，似悦而不怪者。闻言即说，有似于解者，心中漫漫不能悟。有因胜情失，穷而称妙，辞

已穷矣，自以为妙而未尽。跌则踣蹠，理已跌矣，而强牵据。实求两解，似理不可屈者。辞穷理屈，心乐两解，而言犹不止，听者谓之未屈。凡此七似，众人之所惑也。非明镜焉能监之。

夫辩有理胜，理至不可动。有辞胜。辞巧不可屈。理胜者，正白黑以广论，释微妙而通之。说事分明，有如粉黛，朗然区别，辞不溃杂。辞胜者，破正理以求异，求异则正失矣。以白马非白马，一朝而服千人，及其至关禁錮，直而后过也。夫九偏之材，有同，有反，有杂。同则相解，譬水流于水。反则相非，犹火灭于水。杂则相恢。亦不必同，又不必异，所以恢达。故善接论者，度所长而论之。因其所能，则其言易晓。历之不动，则不说也。意在杓马，彼俟他日。傍无听达，则不难也。凡相难讲，为达者听。不善接论者，说之以杂反。彼意在狗，而说以马，彼意大同，而说以小异。说之以杂反，则不入矣。以方入圆，理终不可。善喻者，以一言明数事。辞附于理，则言寡而事明。不善喻者，百言不明一意。辞远乎理，虽泛滥多言，己不自明，况他人乎。百言不明一意，则不听也。自意不明，谁听之。是说之三失也。

善难者，务释事本。每得理而止住。不善难者，舍本而理末。逐其言而接之。舍本而理末，则辞构矣。不寻其本理，而以烦辞相文。善攻强者，下其盛锐，对家强梁，始气必盛，故善攻强者，避其初鼓也。扶其本指，以渐攻之。三鼓气盛，衰则攻易。不善攻强者，引其误辞以挫其锐意。强者意锐，辞或暂误，击误挫锐，理之难也。挫其锐意，则气构矣。非徒群言交错，遂至动其声色。善蹶失者，指其所跌。彼有跌失，暂指不逼。不善蹶失者，因屈而抵其性。陵其屈跌而抵挫之。因屈而抵其性，则怨构矣。非徒声色而已，怨恨逆结于心。或常所思求，久乃得之。仓卒谕人，人不速知，则以为难谕。已自久思，而不恕人。以为难谕，则忿构矣。非徒怨恨，遂生忿争。夫盛难之时，其误难迫。气盛辞误，且当避之。故善难者，徵之使还。气折意还，自相应接。不善难者，凌而激之，虽欲顾藉，其势无由。弃误顾藉，不听其言。其势无由，则妄构矣。妄言非譬，纵横恣口。凡人心有所思，则耳且不能听。思心一至，不闻雷霆。是故并思俱说，竞相制止，欲人之听己，止他人之言，欲使听己。人亦以其方思之故，不了己意，则以为不解。非不解也，当己出言，由彼方思，故人不解。人情莫不讳不解。谓其不解，则性讳怒。讳不解，则怒构矣。不顾道理是非，于其凶怒忿肆。凡此六构，变之所由兴也。

然虽有变构，犹有所得。造事立义，当须理定，故虽有变说小故，终于理定功立。若说而不难，各陈所见，则莫知所由矣。人人竞说，若不难质，则不知何者可用也。由此论之，谈而定理者，眇矣。理多端，人情异，故发言盈庭，莫肯执其咎。必也聪能听序，登高能赋，求物能名，如颜回听哭，苍舒量象。思能造端，子展谋侵晋，乃得诸侯之盟明能见机，舆骈睹目动，即知秦师退。辞能辩意，伊籍答吴王，一拜一起未足为劳。捷能摄失，郭淮答魏帝曰，自知必免防风之诛。守能待攻，墨子谓楚人，吾弟子已学之于宋。攻能夺守，毛遂进曰，今日从为楚，不为赵也，楚王从而谢之。夺能易予。以子之矛，易子之盾，则物主辞穷。兼此八者，然后乃能通于天下之理。通于天下之理，则能通人矣。不能兼有八美，适有一能，所谓偏材之人。则所达者偏，而所有异目矣。各以所通，而立其名。是故聪能听序，谓之名物之材。思能造端，谓之构架之材。明能见机，谓之达识之材。辞能辩意，谓之

贍给之材。捷能摄失，谓之权捷之材。守能待攻，谓之持论之材。攻能夺守，谓之推彻之材。夺能易予，谓之贸说之材。通材之人，既兼此八材，行之以道。与通人言，则同解而心喻。同即相是，是以心相喻。与众人言，则察色而顺性。下有盛色，避其所短。虽明包众理，不以尚人。恒怀谦下，故处物上。聪睿资给，不以先人。常怀退后，故在物上。善言出己，理足则止。通理则止，不务烦辞。鄙误在人，过而不迫。见人过跌，辄当历避。写人之所怀，扶人之所能。扶赞人之所能，则人人自任矣。不以事类犯人之所姻。胡故反。与盲人言，不讳眇瞎之类。不以言例，及己之所长。己有武力，不与嫉虎之伦。说直说变，无所畏恶。通材平释，信而后谏，虽触龙鳞，物无受害者。采虫声之善音，不以声丑，弃其善曲。赞愚人之偶得。不以人愚，废其嘉言。夺与有宜，去就不留。方其盛气，折谢不忤。不避锐跌，不惜屈挠。方其胜难，胜而不矜。理自胜耳，何所矜也。心平志谕，无适无莫，付是非于道理，不贪胜以求名。期于得道而已矣。是可与论经世而理物也。旷然无怀，委之至当。是以世务自经，万物自理。

【大意】

本章主要讨论各类人材的性格及特征，提出所谓四部之理、四家之明、九偏之情，七似之流，以及三失之说，六构之难，八能之通。

明智之人的心性须于常理相合。（理者，分道之理，事之理，义之理，情之理）。只有这样才能明辨是非，成就事业。

偏材往往对理“以性犯明”，引起争论，这种情况很多见，大家各执一辞，争论不休，而难以形成统一意见。如想在争论中以理服人，就必须善于聆听，把握事物发展的次序；善于思考、进行发明创造；智慧足以找出事物变化的根由；言辞足以表达内在的情意；反应快，能发现自己的失误；坚于防守，能够抵御对手的攻击；勇于进攻，能够摧毁对方的堡垒；驳倒对方，能用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的方法，使之陷于被动。此所谓“八通”。

卷中

材能第五

材能大小，其准不同。量力而授，所任乃济。

或曰，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，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。愚以为此非名也。夫人材犹器，大小异，或者以大鼎不能烹鸡，喻大材不能治小，失其名也。夫能之为言，已定之称。先有定质，而后能名生焉。岂有能大而不能小乎？

凡所谓能大而不能小，其语出于性有宽急。宽者弘裕，急者急切。性有宽急，故宜有大小。宽弘宜治大，急切宜治小。宽弘之人，宜为郡国，使下得施其功，而总成其事。急切则烦碎，事不成。急小之人，宜理百里，使事办于己。弘裕则网漏，庶事荒矣。然则郡之与县，异体之大小者也。明能治大郡，则能治小郡，能治大县，亦能治小县。以实理宽急论辨之，则当言大小异宜，不当言能大不能小也。若能大而不能小，仲尼岂不为季氏臣。若夫鸡之与牛，亦异体之小大也。鼎能烹牛，亦能烹鸡，铔能烹鸡，亦能烹犊。故鼎亦宜有大小。若以烹犊，则岂不能烹鸡乎？但有宜与不宜，岂有能与不能。故能治大郡，则亦能治小郡矣。推此论之，人材各有所宜，非独大小之谓也。文者理百官，武者治军旅。夫人材不同，能各有异。有自任之能，修己洁身，总御百官。有立法使人从之之能，法悬人惧，无敢犯也。有消息辨护之能，智意辨护，周旋得节。有德教师人之能，道术深明，动为物教。有行事使人谴让之能，云为得理，义和于时。有司察纠摘之能，督察是非，无不区别。有权奇之能，务以奇计，成事立功。有威猛之能。猛毅昭著，振威敌国。

能出于材。材不同量。材能既殊，任政亦异。是故自任之能，清节之材也。故在朝也，则冢宰之任，为国则矫直之政。其身正，故掌天官而总百揆。立法之能，治家之材也。故在朝也，则司寇之任，为国则公正之政。法无私，故掌秋官而诘奸暴。计策之能，术家之材也。故在朝也，则三孤之任，为国则变化之政。计虑明，故辅三槐而助论道。人事之能，智意之材也。故在朝也，则冢宰之佐，为国则谐合之政。智意审，故佐天官而谐内外。行事之能，谴让之材也。故在朝也，则司寇之任，为国则督责之政。辨众事，故佐秋官而督傲慢。权奇之能，伎俩之材也。故在朝也，则司空之任，为国则艺事之政。伎能巧，故任冬官而成艺事。司察之能，臧否之材也。故在朝也，则师氏之佐，为国则刻削之政。是非章，故佐师氏而察善否。威猛之能，豪杰之材也。故在朝也，则将帅之任，为国则严厉之政。体果毅，故总六师而振威武。

凡偏材之人，皆一味之美。譬饴以甘为名，酒以苦为实。故长于办一官，弓工揉材，而有馀力。而短于为一国。兼掌陶冶，器不成矣。何者？夫一官之任，以一味协五味。盐人调盐，醯人调醯，则五味成矣。譬梓里治材，土官治墙，则厦屋成。一国之政，以无味和五味。水以无味，故五味得其和。犹君体平淡，则百官施其用。又国有俗化，民有剧易，五方不同，风俗各异，土有刚柔，民有剧易。而人材不同，故政有得失。以简治易则得，治烦则失。是以王化之政宜于统大，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。以之治小，则迂。网踈而吞舟之奸漏。辩护之政宜于治烦，事皆辨护，烦乱乃理。以之治易，则无易。甚于督促，民不便也。策术之政宜于治难，权略无方，解释患难。以之治平，

则无奇。术数烦众，民不安矣。矫抗之政宜于治侈，矫枉过正，以厉侈靡。以之治弊，则残。俗弊治严，则民残矣。谐和之政宜于治新，国新礼杀，苟合而已。以之治旧，则虚。苟合之教，非礼实也。公刻之政宜于纠奸，刻削不深，奸乱不止。以之治边，则失众。众民惮法，易逃叛矣。威猛之政宜于讨乱，乱民桀逆，非威不服。以之治善，则暴。政猛民残，滥良善矣。伎俩之政宜于治富，以国强民以使。以之治贫，则劳而下困。易货改铸，民失业矣。故量能授官，不可不审也。凡此之能，皆偏材之人也。故或能言而不能行，或能行而不能言。智胜则能言，材胜则能行。至于国体之人，能言能行，故为众材之隗也。

人君之能，异于此。平淡无为，以任众能。故臣以自任为能，竭力致功，以取爵位。君以用人为能，任贤使能，国家自理。臣以能言为能，各言其能，而受其官。君以能听为能，听言观行，而授其官。臣以能行为能，必行其所言。君以能赏罚为能。必当其功过也。所能不同，君无为而臣有事。故能君众材也。若君以有为，代大匠斫，则众能失巧，功不成矣。

【大意】

衡量一个人有无才能，不能简单地以“大小”来做标准。比如鼎，既用来煮牛，也可用来烹鸡。材能本无大小，但能才却各有不同，叫一位教授和一个建筑工人对换工作，显然不符合实际。因此用人之道在于量材录用。如“臣僚以亲自办事为材能，而君主则以用人为材能；臣僚的材能在于能说，而君主的材能在于能听；臣僚的材能在于执行命令，而君主的材能在于主持赏罚。

利害第六

建法陈术，以利国家。及其弊也，害归于已。

盖人业之流，各有利害。流渐失源，故利害生。夫节清之业著于仪容，发于德行，心清意正，则德容外著。未用而章，其道顺而有化。德辉昭著，故不试而效。效理于人，故物无不化。故其未达也，为众人之所进，理顺则众人乐进之。既达也，为上下之所敬。德和理顺，谁能慢之。其功足以激浊扬清，师范僚友。其为业也无弊而常显。非徒不弊，存而有显。故为世之所贵。德信有常，人不能贱。

法家之业，本于制度，待乎成功而效。法以禁奸，奸止乃效。其道前苦而后治，严而为众。初布威严，是以劳苦，终以道化，是以民治。故其未达也，为众人之所忌。奸党乐乱，忌法者众。已试也，为上下之所惮。宪防肃然，内外振悚。其功足以立法成治，民不为非，治道乃成。其弊也，为群枉之所仇，法行宠贵，终受其害。其为业也，有敝而不常用，明君乃能用之强，明不继世，故法不常用。故功大而不终。是以商君车裂，吴起支解。

术家之业，出于聪思，待于谋得而章。断于未行，人无信者，功成事效而后乃彰也。其道先微而后著，精而且玄。计谋微妙，其始至精，终始合符，是以道著。其未达也，为众人之所不识。谋在功前，众何由识。其用也，为明主之所珍。暗主昧然。岂能贵之。其功足以运筹通变。变以求通，故能成其功。其退也，藏于隐微。计出微密，是以不露。其为业也，奇而希用，主计神奇，用之者希也。故或沈微而不章。世希能用，道何由章。

智意之业，本于原度，其道顺而不忤。将顺时宜，何忤之有。故其未达也，为众人之所容矣。庶事不逆，善者来亲。已达也，为宠爱之所嘉。与众同和，内外美之。其功足以赞明计虑，媚顺于时，言计是信也。其敝也，知进而不退，不见忌害，是以慕进也。或离正以自全。用心多媚，故违于正。其为业也，谄而难持。谄情谄智，非雅正之伦也。故或先利而后害。知进忘退，取悔之道。

臧否之业，本乎是非。其道廉而且砭。清而混杂，砭去纤芥。故其未达也，为众人之所识。清洁不污，在幽而明。已达也，为众人之所称。业常明白，出则受誉。其功足以变察是非。理清道洁，是非不乱。其敝也，为诋诃之所怨。诋诃之徒，不乐闻过。其为业也，峭而不裕。峭察于物，何能宽裕。故或先得而后离众。清亮为时所称，理峭为众所惮。

伎俩之业，本于事能，其道辨而且速。伎计如神，是以速辨。其未达也，为众人之所异。伎能出众，故虽微而显。已达也，为官司之所任。遂事成功，政之所务。其功足以理烦纠邪。释烦理邪，亦须伎俩。其敝也，民劳而下困。上不端而下困。其为业也，细而不泰，故为治之末也。道不平弘，其能太乎。

【大意】

本章主要论述了各种事业的利与弊。以各种事业之所本，未发达或发达后的状况，作为一种事业的特点，及其功过和利弊，直至最终结局。比如“法家的事业，根本于制定法度，等到成功后而奏效。其治国之道，前面辛苦后面安定，严厉但是为了民众。因此当其未成功时，被众人所猜忌，法令施行后，又为上下所畏惧。它的功业足以设立法制，安邦定国。它的弊害在于为众多邪曲所仇视，因此功劳虽大而往往不得善终。

接识第七

推己接物，俱识同体。兼能之士，乃达群材。

夫人初甚难知，貌厚情深，难得知也。而士无众寡皆自以为知人。故以己观人，则以为可知也。己尚清节，则凡清节者皆己之所知。观人之察人，则以为不识也。夫何哉？由己之所尚，在于清节；人之所好，在于利欲。曲直不同于他，便谓人不识物也。是故能识同体之善，性长思谋，则善策略之士。而或失异量之美。遵法者虽美，乃思谋之所不取。何以论其然？夫清节之人以正直为度，故其历众材也能识性行之常，度在正直，故悦有恒之人。而或疑法术之诡。谓守正足以致治，何以法术为也。法制之人以分数为度，故能识较方直之量，度在法分，故悦方直之人。而不贵变化之术。谓法分足以济业，何以术谋为也。术谋之人以思谋为度，故能成策略之奇，度在思谋，故贵策略之人。而不识遵法之良。谓思谋足以化民，何以法制为也。器能之人以辨护为度，故能识方略之规，度在辨护，故悦方计之人。而不知制度之原。谓方计足以立功，何以制度为也。智意之人以原意为度，故能识韬谲之权，度在原意，故悦韬谲之人。而不贵法教之常。谓原意足以为正，何以法理为也。伎俩之人以邀功为度，故能识进趣之功，度在邀功，故悦功能之人。而不通道德之化。谓伎能足以成事，何以道德为也。臧否之人以伺察为度，故能识诃砭之明，度在伺察，故悦谴诃之人。而不畅倜傥之异。谓谴诃乃成教，何以宽弘为也。言语之人以辨析为度，故能识捷给之惠，度在剖析，故悦敏给之人。而不知含章之美。谓辩论事乃理，何以含章为也。

是以互相非驳，莫肯相是。人皆自以为是，谁肯道人之是。取同体也，则接论而相得。性能苟同，则虽胡越，接响而情通。取异体也，虽历久而不知。性能苟异，则虽比肩，历年而逾踈矣。凡此之类，皆谓一流之材也。故同体则亲，异体则踈。若二至已上，亦随其所兼，以及异数。法家兼术，故能以术辅法。故一流之人，能识一流之善。以法治者，所以举不过法。二流之人，能识二流之美。体法术者，法术兼行。尽有诸流，则亦能兼达众材。体通八流，则八材当位，物无不理。故兼材之人与国体同。谓八材之人始进陈言，冢宰之官，察其所以。

欲观其一隅，则终朝足以识之。将究其详，则三日而后足。何谓三日而后足？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，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。一以论道德，二以论法制，三以论策术，然后乃能竭其所长，而举之不疑。在上者兼明八材，然后乃能尽其所进，用而无疑矣。

然则何以知其兼偏，而与之言乎？察言之时，何以识其偏材，何以识其兼材也。其为人也，务以流数杼人之所长，而为之名目，如是兼也。每因事类，杼尽人之所能，为之名目，言不容口。如陈以美欲人称之，己之有善，因事自说，又欲令人言常称己。不欲知人之所有，如是者偏也。人之有善，耳不乐闻，人称之，口不和也。不欲知人，则言无不疑。闻法则疑其刻削，闻术则疑其诡诈。是故以深说浅，益深益异。浅者意近，故闻深理而心逾炫。是以商君说帝王之道不入，则以强兵之义示之。异则相返，反则相非。闻深则心炫，焉得而相是，是以李兑塞耳而不听苏秦之说。是故多陈处直，则以为见美。以其多方疑似见美也。静听不言，则以为虚空。待时来语，疑其无实。抗为高谈，则为不逊。辞护理高，疑其凌己。逊让不尽，则以为浅陋。卑言寡气，疑其浅薄。言称一善，则以为不博。未敢多陈，疑其陋狭。历发

众奇，则以为多端。偏举事类，则欲以释之，复以为多端。先意而言，则以为分美。言合其意，疑分己美。因失难之，则以为不喻。欲补其失，反不喻也。说以对反，则以为较己。欲反其事而明言，乃疑其较也。博以异杂，则以为无要。控尽所怀，谓之无要。论以同体，然后乃悦。弟兄忿肆，为陈管蔡之事，则欣畅而和悦。于是乎有亲爱之情，称举之誉，苟言之同，非徒亲爱而已，乃至誉而举之。此偏材之常失。意常姻护，欲人同己，己不必得，何由暂得。

【大意】

所谓“接识”就是指人在待人接物时的表现。本章主要讨论了偏材在接识别人时的局限性，他们往往只能接受同类型的人，而不能以更宽宏的胸襟，从别人的立场去评价别人的长处。这似乎是一种通病，人人都陈说自己的优点，希望得到称赞，而自己却不想了解对方的优点，这样的人就是偏材。

在社会交际中，人应该摒弃偏狭，不要以为自己衡量人的标准是唯一正确的，从而限制自己不能发现别人的长处，难与别人沟通，从而遭到孤立。

英雄第八

自非平淡，能各有名。英为文昌，雄为武称。

夫草之精秀者为英，兽之特群者为雄。物尚有之，况于人乎。故人之文武茂异，取名于此。文以英为名，武以雄为号。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，胆力过人谓之雄，此其大体之别名也。若校其分数，则互相须，英得雄分，然后成章，雄得英分，然后成刚。各以二分，取彼一分，然后乃成。胆者雄之分，智者英之分。英有聪明，须胆而后成；雄有胆力，须知而后立。

何以论其然？夫聪明者英之分也，不得雄之胆，则说不行。智而无胆，不能正言。胆力者雄之分也，不得英之智，则事不立。勇而无谋，不能立事。是故英以其聪谋始，以其明见机，智以谋事之始，明以见事之机。待雄之胆行之。不决则不能行。雄以其力服众，以其勇排难，非力众不服，非勇难不排。待英之智成之。智以制宜，巧乃可成。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。譬金待水而成利功，物得水然后成养功。若聪能谋始，而明不见机，乃可以坐论，而不可以处事。智能坐论，而明不见机，何事务之能处。聪能谋始，明能见机，而勇不能行，可以循常，而不可以虑变。明能循常，勇不能行，何应变之能为。若力能过人，而勇不能行，可以为力人，未可以为先登。力虽绝群，胆雄不决，何先锋之能为。力能过人，勇能行之，而智不能断事，可以为先登，未足以为将帅。力能先登，临事无谋，何将帅之能为。必聪能谋始，明能见机，胆能决之，然后可以为英，张良是也。气力过人，勇能行之，智足断事，乃可以为雄，韩信是也。体分不同，以多为目。故英雄异名。张良英智多，韩信雄胆胜。然皆偏至之材，人臣之任也。故英可以为相，制胜于近。雄可以为将，杨威于远。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，则能长世，高祖、项羽是也。

然英之分以多于雄，而英不可以少也。英以致智，智能役雄，何可少也。英分少，则智者去之。故项羽气力盖世，明能合变，胆烈无前，济江焚粮。而不能听采奇异，有一范增不用，是以陈平之徒皆亡归。高祖英分多，故群雄服之，英材归之，两得其用。雄既服矣，英又归之。故能吞秦破楚，宅有天下。然则英雄多少，能自胜之数也。胜在于身，则能胜物。徒英而不雄，则雄材不服也。内无主于中，外物何由入。徒雄而不英，则智者不归往也。无名以接之，智者何由往。故雄能得雄，不能得英。兕虎自成群也。英能得英，不能得雄。鸾凤自相亲也。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，乃能役英与雄。能役英与雄，故能成大业也。武以服之，文以绥之，则业隆当年，福流后世。

【大意】

“英雄”一词现在虽合而为一，但两字却是有分别的。做为人的素质成份，“英”偏重于人的智慧、计谋，而“雄”则重在人的勇气和胆略。英材或雄材都是“偏材”。英和雄是相互关联的，二者结合起来，才能成就事业。只有“英”而无“雄”，空有好的计划，却无勇气使其成为现实；缺少了智慧，勇字当头，至多为一勇夫。而且，二者的成份，“英”宜多于“雄”，刘邦和项羽同为英雄，但结局大异，由此可见一斑！

八观第九

群才异品，志各异归。观其通否，所格者八。

八观者：一曰，观其夺救，以明间杂。或慈欲济恤而吝夺某人，或救济广厚而乞醯为惠。二曰，观其感变，以审常度。观其愠作，则常度可审。三曰，观其志质，以知其名。徵质相应，睹色知名。四曰，观其所由，以辨依似。依讦似直，仓卒难明。察其所安，昭然可辨。五曰，观其爱敬，以知通塞。纯爱则物亲而情通，纯敬则理踈而情塞。六曰，观其情机，以辨怨惑。得其所欲则怨，违其所欲则惑。七曰，观其所短，以知所长。讦刺虽短，而长于为直。八曰，观其聪明，以知所达。虽体众材，而材不聪明，事事蔽塞，其何能达。

何谓观其夺救，以明间杂？夫质有至、有违，刚质无欲，所以为至。贪情或胜，所以为违。若至胜违，则恶情夺正。若然而不然。以欲胜刚，以此似刚而不刚。故仁出于慈，有慈而不仁者。仁必有恤，有仁而不恤者。厉必有刚，有厉而不刚者。若夫见可怜则流涕，慈心发于中。将分与则吝嗇，是慈而不仁者。为仁者必济恤。睹危急则惻隐，仁情动于内。将赴救则畏患，是仁而不恤者。为恤者必赴危。处虚义则色厉，精厉见于貌。顾利欲则内荏，是厉而不刚者。为刚者必无欲。然则慈而不仁者，则吝夺之也。爱财伤于慈。仁而不恤者，则惧夺之也。恒怯损于仁。厉而不刚者，则欲夺之也。利欲害于刚。故曰，慈不能胜吝，无必其能仁也。爱则不施，何于仁之为能。仁不能胜惧，无必其能恤也。畏懦不果，何恤之能行。厉不能胜欲，无必其能刚也。情存利欲，何刚之能成。是故不仁之质胜，则伎力为害器。仁质既弱而有伎力，此害己之器也。贪悖之性胜，则强猛为祸梯。廉质既负而性强猛，此祸己之梯也。亦有善情救恶，不至为害，恶物宜翦而除，纯善之人怜而救之，此稠厚之人，非大害也。爱惠分笃，虽傲狎不离，平生结交情厚分深，虽原壤夷俟而不相弃，无大过也。助善著明，虽疾恶无害也。如杀无道以就有道，疾恶虽甚，无大非也。救济过厚，虽取人，不贪也。取人之物以有救济，虽讥在乞醯，非大贪也。是故观其夺救，而明间杂之情，可得知也。或畏吝夺慈仁，或救过济其分，而平淡之主顺而恕。

何谓观其感变，以审常度？夫人厚貌深情，将欲求之，必观其辞旨，察其应赞。视发言之旨趣，观应和之当否。夫观其辞旨，犹听音之善丑。音唱而善丑别。察其应赞，犹视智之能否也。声和而能否别。故观辞察应，足以互相别识。彼唱此和，是非相举。然则论显扬正，白也。辞显唱正，是曰明白。不善言应，玄也。默而识之，是曰玄也。经纬玄白，通也。明辨是非，可谓通理。移易无正，杂也。理不一据，言意浑杂。先识未然，圣也。追思玄事，睿也。见事过人，明也。以明为晦，智也。心虽明之，常若不足。微忽必识，妙也。理虽至微，而能察之。美妙不昧，疏也。心致昭然，是曰疏朗。测之益深，实也。心有实智，探之愈精，犹泉滋中出，测之益深也。假合炫耀，虚也。道听途说，久而无实。犹池水无源，泄而虚竭。自见其美，不足也。智不赡足，恐人不知以自伐。不伐其能，有余也。不畏不知。故曰，凡事不度，必有其故。色貌失实，必有忧喜之故。忧患之色，乏而且荒。忧患在心，故形色荒。疾疚之色，乱而垢杂。黄黑色杂，理多尘垢。喜色愉然以怿，愠色厉然以扬；妒惑之色，冒昧无常。粗白粗赤，愤愤在面。及其动作，盖并言辞。色既发扬，言亦从之。是故其言甚怪，而精色不从者，中有

违也。心恨而言强和，色貌终不相从。其言有违，而精色可信者，辞不敏也。言不自尽，故辞虽违而色貌可信。言未发而怒色先见者，意愤溢也。愤怒填胸者，未言而色貌已作。言将发而怒气送之者，强所不然也。欲强行不然之事，故怒气助言。凡此之类，徵见于外，不可奄违。心欢而怒容，意恨而和貌。虽欲违之，精色不从。心动貌从。感愕以明，虽变可知。情虽在内，感愕发外，千形万貌，粗可知矣。是故观其感变而常度之情可知。观人辞色而知其心，物有常度，然后审矣。

何谓观其至质，以知其名？凡偏材之性，二至以上，则至质相发，而令名生矣。二至，质气之谓也。质直气清，则善名生矣。是故骨直气清，则休名生焉。骨气相应，名是以美。气清力劲，则烈名生焉。气既清矣，力劲刚烈。劲智精理，则能名生焉。智既劲矣，精理则能称。智直强恣，则任名生焉。直而又美，是以见任。集于端质，则令德济焉。质徵端和，善德乃成。加之学，则文理灼焉。圭玉有质，莹则成文。是故观其所至之多少，而异名之所生可知也。寻其质气，览其清浊，虽有多少之异，异状之名，断可知之。

何谓观其所由，以辨依似？夫纯讦性违，不能公正。质气俱讦，何正之有。依讦似直，以讦讦善，以直之讦，计及良善。纯宥似流，不能通道。质气俱宥，何道能通。依宥似通，行傲过节。似通之宥，容傲无节。故曰，直者亦讦，讦者亦讦，其讦则同，其所以为讦则异。直人之讦，讦恶憚非，纯讦为讦，讦善刺是。通者亦宥，宥者亦宥，其宥则同，其所以为宥则异。通人之宥，简而达道。纯宥，傲僻以自恣。然则何以别之？直而能温者，德也；温和为直，所以为德。直而好讦者，偏也；性直过讦，所以为偏。讦而不直者，依也；纯讦似直，所以为依。道而能节者，通也。以道自节，所以为通。通而时过者，偏也；性通时过，所以为偏。宥而不节者，依也。纯宥似通，所以为依。偏之与依，志同质违，所谓似是而非也。质同通直，或偏或依。是故轻诺，似烈而寡信。不量己力，轻许死人，临难畏怯，不能殉命。多易，似能而无效。不顾材能，日谓能办，受事猖獗，作无效验。进锐，似精而去速。精躁之人，不能久任。诤者，似察而事烦。诤诤之人，每多烦乱。讦施，似惠而无成。当时似给，终无所成。面从，似忠而退违，阿顺目前，却则自是。此似是而非者也。紫色乱朱，圣人恶之。亦有似非而是者。事同于非，其功实则是。大权，似奸而有功。伊去太甲，以成其功。大智，似愚而内明。终日不违，内实分别。博爱，似虚而实厚。泛爱无私，似虚而实。正言，似讦而情忠。譬帝桀纣，至诚忠爱。夫察似明非，御情之反，欲察似类审，则是非御，取人情反复明之。有似理讼，其实难别也。故圣人参讯广访，与众共之。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得其实。若其实可得，何忧乎驩兜，何迁乎有苗。是以昧旦晨兴，扬明仄陋，语之三槐，询九棘。故听言信貌，或失其真。言讷貌恶，仲尼失之子羽。诡情御反，或失其贤。疑非人情，公孙失之卜式。贤否之察，实在所依。虽其难知，即当寻其所依而察之。是故观其所依，而似类之质可知也。虽其不尽得其实，然察其所依似，身其体气，粗可几矣。

何谓观其爱敬，以知通塞？盖人道之极，莫过爱敬。爱生于父子，敬立于君臣。是故《孝经》以爱为至德，起父子之亲，故为至德。以敬为要道。终君臣之义，故为道之要。《易》以感为德，气通生物，人得之以利养。以谦为道。尊卑殊别，道之次序。《老子》以无为德，施化无方，德之则也。以虚为道。寂寞无为，道之伦也。《礼》以敬为本。礼由阴作，肃然清静。《乐》以爱为主。乐由阳来，欢然亲爱。然则人情之质，有爱敬之诚，方在

哺乳，爱敬生矣。则与道德同体，动获人心，而道无不通也。体道修德，故物顺理通。然爱不可少于敬。少于敬，则廉节者归之，廉人好敬，是以归之。而众人不与。众人乐爱，爱少，是以不与。爱多于敬，则虽廉节者不悦，而爱接者死之。廉人寡，常人众，众人乐爱致其死，则事成业济。是故爱之为道，不可少矣。何则？敬之为道也，严而相离，其势难久。动必肃容，过之不久。逆旅之人，不及温和而归也。爱之为道也，情亲意厚，深而感物。煦渝笃密，感物深感，是以翳桑之人，倒戈报德。是故观其爱敬之诚，而通塞之理可德而知也。笃于慈爱，则温和而上下之情通。务在礼敬，则严肃而外内之情塞。然必爱敬相须，不可一时而无。然行其二义者，常当务令爱多敬少，然后肃穆之风可得希矣。

何谓观其情机，以辨怨惑？夫人之情有六机，杼其所欲，则喜。为有力者誉乌获，其心莫不忻焉。不杼其所能，则怨。为辨给者称三緘，其心莫不忿然。以自伐历之，则恶。抗己所能以历众人，众人所恶。以谦损下之，则悦。卑损下人，人皆喜悦。犯其所乏，则姻。人皆悦己所长，恶己所短。故称其所短，则姻戾忿肆。以恶犯姻，则妒。自伐其能，人皆所恶也，称人之短，人所姻也。今伐其所能，犯人所姻，则妒害生也。此人性之六机也。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。志之所欲，欲遂已成。故烈士乐奋力之功，遭难而力士奋。善士乐督政之训，政修而善士用。能士乐治乱之事，治乱而求贤能。术士乐计策之谋，广算而求其策。辨士乐陵讯之辞，宾赞而求辨给。贪者乐货财之积，货财积，则贪者容其求。幸者乐权势之尤。权势之尤，则幸者窃其柄。苟赞其志，则莫不欣然。是所谓杼其所欲，则喜也。所欲之心杼尽，复何怨乎？若不杼其所能，则不获其志。不获其志，则戚。忧己才之不振。是故功力不建，则烈士奋。奋，愤不能尽其材也。德行不训，则正人哀。哀，哀不得行其化。政乱不治，则能者叹。叹，叹不得用其能。敌能未弭，则术人思。思，思不得运其奇。货财不积，则贪者忧。忧，忧无所收其利。权势不尤，则幸者悲。悲，悲不得弄其权。是所谓不杼其能，则怨也。所怨不杼其能悦也。人情莫不欲处前，故恶人之自伐。皆欲居物先，故恶人之自伐也。自伐，皆欲胜之类也。是故自伐其善，则莫不恶也。恶其有胜己之心。是所谓自伐历之，则恶也。是以达者终不自伐。人情皆欲求胜，故悦人之谦。谦所以下之。下有推与之意，是故人无贤愚，接之以谦，则无不色怪。不问能否，皆欲胜人。是所谓以谦下之，则悦也。是以君子终日谦谦。人情皆欲掩其所短，见其所长。称其所长则悦，称其所短则愠。是故人驳其所短，似若物冒之。情之愤闷，有若覆冒。是所谓驳其所乏，则姻也。覆冒纯塞，其心姻戾。人情陵上者也。见人胜己皆欲陵之。陵犯其所恶，虽见憎，未害也。虽恶我自伐，未甚疾害也。若以长驳短，是所谓以恶犯姻，则妒恶生矣。以己之长，驳人之短，而取其害，是以达者不为之也。凡此六机，其归皆欲处上。物之自大，人人皆尔。是以君子接物，犯而不校。知物情好胜，虽或以小犯己，终不校拒也。不校，则无不敬下，所以辟其害也。务行谦敬，谁害之哉。小人则不然。既不见机，不达妒害之机。而欲人之顺己，谓欲人无违己。以佯爱敬为见异，孔光逡巡，董贤欣喜。以偶邀会为轻，谓非本心忿其轻己。苟犯其机，则深以为怨。小人易悦而难事。是故观其情机，而贤鄙之志可得而知也。贤明志在退下，鄙劣志在陵上。是以平淡之主，御之以正，训贪者之所忧，戒幸者之所悲。然后物不自伐，下不陵上，贤否当位，治道有序。

何谓观其所短，以知所长？夫偏材之人，皆有所短。智不能周也。故直之失也，讦。刺讦伤于义，故其父攘羊，其子证之。刚之失也，厉。刚切伤于理，故谏君不从，承之以剑。和之失也，懦。懦弱不及道，故宫之奇为人挠，不能强谏。介之失也，拘。拘愚不达事，尾生守信，死于桥下。夫直者不讦，无以成其直。既悦其直，不可非其讦。用人之直，恕其讦也。讦也者，直之徵也。非讦不能为直。刚者不厉，无以济其刚。既悦其刚，不可非其厉。用人之刚，恕其厉也。厉也者，刚之徵也。非厉不能为刚。和者不懦，无以保其和。既悦其和，不可非其懦。用人之和，恕其拘也。拘也者，和之徵也。非懦不能为和。介者不拘，无以守其介。既悦其介，不可非其拘。用人之介，恕其拘也。拘也者，介之徵也。非拘不能为介。然有短者，未必能长也。纯讦之人，未能正直。有长者，必以短为徵。纯和之人，徵必懦弱。是故观其徵之所短，而其材之所长可知也。欲用其刚，必采之于厉。

何谓观其聪明，以知所达？夫仁者，德之基也。载德而行。义者，德之节也。制德之所宜也。礼者，德之文也。礼，德之文理也。信者，德之固也。固，德之所执也。智者，德之帅也。非智不成德。夫智出于明。明达乃成智。明之于人，犹昼之待白日，夜之待烛火。火日所以照昼夜，智达所以明物理。其明益盛者，所见及远。火日愈明，所照愈远，智达弥明，理通弥深。及远之明，难。圣人犹有不及。是故守业勤学，未必及材。生知者上，学能者次。材艺精巧，未必及理。因习成巧，浅于至理。理义辨给，未必及智。理成事业，昧于玄智。智能经事，未必及道。役智经务，去道远矣。道思玄远，然后乃周道无不载，故无不周。是谓学不及材，材不及理，理不及智，智不及道。道智玄微，故四变而后及。道也者，回复变通。理不系一，故变通之。是故别而论之，各自独行，则仁为胜。仁者济物之资，明者见理而已。合而俱用，则明为将。仁者待明，其功乃成。故以明将仁，则无不怀。威以使之，仁以恤之。以明将义，则无不胜。示以断割之宜。以明将理，则无不通。理若明练，万事乃达。然则苟无聪明，无以能遂。暗者昧时，何能成务成遂。故好声而实不克，则恢。恢迂远于实。好辩而理不至，则烦。辞烦而无正理。好法而思不深，则刻。刻过于理。好术而计不足，则伪。诡诬诈也。是故钧材而好学，明者为师。比力而争，智者为雄。等德而齐，达者称圣。圣之为称，明智之极明也。是以动而为天下法，言而为万世范，居上位而不亢，在下位而不闷。是以观其聪明，而所达之材可知也。

【大意】

八观：一是观察一个人对待争夺和救济的态度，以分辨他是否反复变化，没有恒性；二是观察一个人的感情变化和反应，以了解他做人的基本准则；三是观察一个人的至性本质，以知道他的名声是否与实际相符；四是观察一个人的行为表现，以辨识他所作所为是否似是而非；五是观察一个人对别人的爱敬态度，以判断他为人处世之道的成败；六是观察一个人的情绪欲望，以明了他是宽恕还是疑惑；七是观察一个人的短处，以认识他的长处；八是观察一个人是否聪明，以分析他所能通达的方面。

“八观”之说，在人才的鉴定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详细的可操作的方法。尤其可贵的是他告诉我们要根据性情的常和变，多方面，综合地考察一个人的真实情况，这样才能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由此及彼，由表及里。

此外，以一个人的短处发现其长处，也是颇有见地的评鉴人材的方法。这些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

卷下

七繆第十

人物之理，妙而难明，以情鉴察，繆犹有七。

七繆：一曰，察誉，有偏颇之繆。微质不明，故听有偏颇也。二曰，接物，有爱恶之惑。或情同，忘其恶，或意异，违其善也。三曰，度心，有大小之误。或小知而大无成，或小暗而大无明。四曰，品质，有早晚之疑。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。五曰，变类，有同体之嫌。材同势均，则相竞，材同势倾，则相敬。六曰，论材，有申压之诡。藉富贵则惠施而名申，处贫贱则乞求而名压。七曰，观奇，有二尤之失。妙尤含藏，直尤虚瑰，故察难中也。

夫采访之要，不在多少。事无巨细，要在得正。然微质不明者，信耳而不敢信目。目不能察而信于耳。故人以为是，则心随而明之。人以为非，则意转而化之。信人毁誉，故向之所是，化而为非。虽无所嫌，意若不疑。信毁誉者心虽无嫌，意固疑矣。且人察物，亦自有误。爱憎兼之，其情万原。明既不察，加之爱恶是非，是疑岂可胜计。不畅其本，胡可必信。去爱憎之情，则实理得矣。是故知人者，以目正耳。虽听人言，常正之以目。不知人者，以耳败目。亲见其诚，犹信毁而弃之。故州闾之士，皆誉皆毁，未可为正也。或众附阿党，或独立不群。交游之人誉不三周，未必信是也。交结致誉，不三周，色貌取人，而行违之。夫实厚之士，交游之间，必每所在肩称。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行矣。上等援之，下等推之，蛮貊推之，况州里乎。苟不能周，必有咎毁。行不笃敬者，或谄谀得上而失于下，或阿党得下而失于上。故偏上失下，则其终有毁。非之者多，故不能终。偏下失上，则其进不杰。众虽推之，上不信异。故诚能三周，则为国所利。此正直之交也。由其正直，故名有利。故皆合而是，亦有违比。或违正阿党，故合而是之。皆合而非，或在其中。或特立不群，故合而非之。若有奇异之材，则非众所见。奇逸绝众，众何由识，而耳所听采，以多为信。不能审查其材，但信众人言也。是繆于察誉者也。信言察物，必多繆失。是以圣人如有所誉，必有所试。

夫爱善疾恶，人情所常。不问贤愚，情皆同之也。苟不明质，或疏善，善非。非者见善，善者见疏，岂故然哉，由意不明。何以论之。夫善非者，虽非犹有所是。既有百非，必有一是。以其所是，顺己所长，恶人一非，与己所长同也。则不自觉情通意亲，忽忘其恶。以与己同，忘其百非，谓矫驾为至孝，残桃为至忠。善人虽善，犹有所乏。虽有百善，或有一短。以其所乏，不明己长。善人一短，与己所长异也。以其所长，轻己所短，则不自知志乖气违，忽忘其善，以与己异，百善皆弃，谓曲杖为匕首，葬楯为反具耶。是惑于爱恶者也。微质暗昧者，其于接物常以爱恶惑异其正。

夫精欲深微，质欲懿重，志欲弘大，心欲谦小。精微，所以入神妙也。慥则失神。懿重，所以崇德宇也。躁则失身。志大，所以戡物任也。小则不胜。心小，所以慎咎悔也。大则骄陵。故诗咏文王，“小心翼翼”，“不大声以色”，小心也。言不贪求大名，声见于颜色。“王赫斯怒”，“以对于天下”，志大也。故能诛纣，定天下，以致太平。由此论之，心小志大者，圣贤之伦也。心小，故以服事殷，志大，故三分天下有其二。心大志大者，

豪杰之隼也。志大而心又大，故名豪隼。心大志小者，傲荡之类也。志小而心阔远，故为傲荡之流也。心小志小者，拘悞之人也。心近志短，岂能弘大。众人之察，或陋其心小，见沛公烧绝栈道，谓其不能定天下。或壮其志大，见项羽号称强楚，便谓足以匡诸侯。是误于小大者也。由智不能察其度，心常误于小大。

夫人材不同，成有早晚，有早智而速成者，质清气朗，生则秀异，故童乌苍舒，总角曜奇也。有晚智而晚成者，质重气迟则久乃成器，故公孙含道，老而后章。有少无智而终无所成者，质浊气暗，终老无成，故原壤年老，圣人叩脰而不能化。有少有令材遂为隼器者。幼而通理，长则愈明，故常材发奇于应宾，效德于公相。四者之理，不可不察。当察其早晚，随时而用之。夫幼智之人，材智精达，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绪。仲尼戏言俎豆，邓艾指图军旅。故文本辞繁，初辞繁者，长必文丽。辩始给口。幼给口者，长必辩论也。仁出慈恤，幼慈恤者，长必矜人。施发过与。幼过与者，长必好施。慎生畏惧，幼多畏者，长必谨慎。廉起不取。幼不妄取，长必清廉。早智者浅惠而见速，见小事则达其形容。晚成者奇识而舒迟，智虽舒缓，能识其妙。终暗者并困于不足，事务难易，意皆昧然。遂务者周达而有余。事无大小，皆能极之。而众人之察，不虑其变，常以一概，责于终始。是疑于早晚者也。或以早成而疑晚智，或以晚智而疑早成，故于品质，常有妙失也。

夫人情莫不趣名利，避损害。名利之路，在于是得。是得在己，名利与之。损害之源，在于非失。非失在己，损害攻之。故人无贤愚，皆欲使是得在己。贤者尚然，况愚者乎。能明己是，莫过同体。体同于我，则能明己。是以偏材之人，交游进趋之类，皆亲爱同体而誉之，同体能明己，是以亲而誉之。憎恶对反而毁之。与己体反，是以恶而疏之。序异杂而不尚也。不与己同，不与己异，则虽不憎，亦不尚之。推而论之，无他故焉。夫誉同体，毁对反，所以证彼非而著己是也。由与己同体，故证彼非，而著己是也。至于异杂之人，于彼无益，于己无害，则序而不尚。不以彼为是，不以己为非，都无损益，何所尚之。是故同体之人，常患于过誉，譬惧为力人，则力小者慕大，力大者提小，故其相誉，常失其实也。及其名敌，则鲜能相下。若俱能负鼎，则争胜之心生，故不能相下。是故直者性奋，好人行直于人。见人正直，则心好之。而不能受人之讦。刺己之非，则讦而不受。尽者情露，好人行尽于人，见人颖露，则心好之。而不能纳人之径。说己径尽，则违之不纳。务名者乐人之进趋过人，见人乘人，则悦其进趋。而不能出陵己之后。人陵于己，则忿而不服。是故性同而材倾，则相援而相赖也。并有旅力，则大能奖小。性同而势均，则相竞而相害也。恐彼胜己，则妒善之心生。此又同体之变也。故或助直而毁直。人直过于己直，则非毁之心生。或与明而毁明。人明过于己明，则妒害之心动。而众人之察不辨其律理，是嫌于体同也。体同尚然，况异体乎。

夫人所处异势，势有申压。富贵遂达，势之申也。身处富贵，物不能屈，是以佩六国之印，父母迎于百里之外。贫贱穷匮，势之压也。身在贫贱，志何申展，是以黑貂之裘弊，妻嫂堕于闺门之内。上材之人，能行人所不能行。凡云为动静，固非众人之所及。是故达有劳谦之称，穷有著明之节。材出于众，其进则裒多益寡，劳谦济世，退则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，中材之人，则随世损益。守常之智，申压在时，故势来则益，势去则损。是故籍富贵则货财充于内，施惠周於外。贤材有余，恣意周济。见赡者，求可称而誉之。感

其恩纪，匡救其恶，是以朱建受金，而为食其画计。见援者，阐小美而大之。感其引援，将顺其美，是以曹丘见接，为季布扬名。虽无异材，犹行成而名立。夫富与贵可不欣哉，乃至无善而行成。无智而名立。是以富贵妻嫂恭，况他人乎。处贫贱，则欲施而无财，欲援而无势。有慈心而无以拯，识奇材而不能援。亲戚不能恤，朋友不见济。内无疏食之馈，外无缁袍之赠。分义不复立，恩爱浸以离。意气皆空薄，分意何由立。怨望者并至，归非者日多。非徒薄己，遂生怨谤之言。虽无罪尤，犹无故而废也。夫贫与贱可不惧哉，乃至无由而生谤，无罪而见废，是故贫贱妻子慢，况他人乎。故世有侈俭，名由进退。行虽在我，而名称在世，是以良农能稼，未必能穡。天下皆富，则清贫者虽苦，必无委顿之忧。家给人足，路人皆馈之。且有辞施之高，以获荣名之利。得辞施之高名，受余光之善利。皆贫，则求假无所告，家贫户乏，粟成珠玉。而有贫乏之患，且生鄙吝之讼。乞假无遗，与嫂叔争糟糠。是故钩材而进有与之者，则体益而茂遂。己既自足，复须给赐，则名美行成，所为遂达。私理卑抑有累之者。己既不足，亲戚并困。则微降而稍退。上等不援，下等不推。而众人之观，不理其本，各指其所在，谓申达者为材能，压屈者为愚短。是疑于申压者也。材智虽钧，贵贱殊途，申压之变，在乎贫富。

夫清雅之美，著乎形质，察之寡失。形色外著，故可得而察之。失缪之由，恒在二尤。二尤之生，与物异列。是故非常人之所见。故尤妙之人，含精于内，外无饰姿。譬金冰内明而不外朗，故冯唐白首屈于郎署。尤虚之人，硕言瑰姿，内实乖反。犹烛火外照，灰烬内暗，故主父偃辞丽，一岁四迁。而人之求奇，不可以精微测其玄机，明异希。其尤奇异，非精不察。或以貌少为不足，睹醜貌恶，便疑其浅陋。或以瑰姿为巨伟。见江充貌丽，便谓其巨伟。或以直露为虚华，以其欵尽，疑无厚实。或以巧饬为真实。巧言如流，悦而睹之。是以早拔多误，不如顺次。或以甘罗为早成而用之，于早岁，或误复欲顺次也。夫顺次，常度也。苟不察其实，亦焉往而不失。徵质不明，不能识奇，故使顺次，亦不能得。故遗贤而贤有济，则恨在不早拔。故郑伯谢之于烛武。拔奇而奇有败。则患在不素别。故光武悔之于朱浮。任意而独缪，则悔在不广问。秦穆不从蹇叔，虽追誓而无及。广问而误己，则怨己不自信。隗嚣心存于汉，而为王元所误。是以骥子发足，众士乃误。韩信立功，淮阴乃震。夫岂恶奇而好疑哉。乃尤物不世见，而奇逸美异也。故非常人之所识也。是以张良体弱，而精疆为众智之隗也。不以质弱而伤于智。荆叔色平，而神勇为众勇之杰也。不以色和而伤于勇。然则隗杰者，众人之尤也。奇逸过于众人，故众人不能及。圣人者，众尤之尤也。通达过于众奇，故众奇不能逮。其尤弥出者，其道弥远。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与于此。故一国之隗，于州为辈，未得为第也。郡国之所隗异，比于州郡，未及其第目。一州之第，于天下为根。州郡之所第目，以比天下之隗，根而不可及。根，一回反，枢也。天下之根，世有优劣。英人不世继，是以伊，召，管，齐，应运乃出。是故众人之所贵，各贵其出己之尤，智材胜己，则以为贵。而不贵尤之所尤。尤之尤者，非众人之所识。是故众人之明，能知辈士之数，众人明者，粗知郡国出辈之士而已。而不能知第目之度。乃未识郡国品第之隗。辈士之明，能知第目之度，出辈明者，粗知郡国第目之良。不能识出尤之良也。未识出尤奇异之理。出尤之人，能知圣人之教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不能究之入室之奥也。如有所立卓尔，虽欲从之，未由也已。由是论之，人

物之理，妙不可得而穷已。为当拟诸形容，象其物宜，观其会通，举其一隅而已。

【大意】

鉴定人物时有七种常见的谬误。一是考察名声，有偏于一方的错误；二是待人接物，会受到个人好恶之情的困扰；三是审度心志，有大小情况不分的错误；四是品评人材素质，会忽略早智与晚成的区别；五是辨误类型，有类别相同，不易看清的疑惑，六是评论才能，有受提拔和被压制的复杂情况；七是观察奇材，时常忽略对尤妙与尤虚之人的注意。

这些谬误的出现，原因在于：一是只信耳，不信目，人云亦云，不经过自己的观察分析；二是加杂个人的主观好恶，而不作客观冷静的评价，常常排斥异己；三是只看表面现象，不做深入了解；四是观察片面，缺少全面的分析；六是出于私人的恩怨，有意夸大或贬低对一个人的评价，七是一般人受自己的思想、视野的限制，无法了解有特殊才能的人或超过自己的人材。

效难第十一

人材精微，实自难知，知之难审，效荐之难。

盖知人之效有二难。有难知之难，尤奇游杂，是以难知。有知之而无由得效之难。己虽知之，无由得荐。何谓难知之难？人物精微，智无形状，奇逸精妙。能神而明，欲入其神，而明其智。其道甚难，固难知之难也。知人则哲，惟帝难之，况常人乎。是以众人之察不能尽备。各守其一方而已。故各自立度，以相观采。以己所能，历观众才。或相其形容，以貌状取人。或候其动作，以进趋取人。或揆其终始，以发正取人。或揆其儼象，以旨意取人。或推其细微，以情理取人。或恐其过误，以简恕取人。或循其所言，以辞旨取人。或稽其行事。以功效取人。八者游杂，各以意之所可为准，是以杂而无纪。故其得者少，所失者多。但取其同于己，而失其异于己，己不必兼，故失者多。是故必有草创信形之误，或色貌取人而行违。又有居止变化之谬。或身在江海，心存魏阙。故其接遇观人也，随行信名，失其中情。是以圣人听言观行，如有所誉，必有所试。故浅美扬露，则以为有异。智浅易见状似异美。深明沉漠，则以为空虚。智深内明，状似无实。分别妙理，则以为离娄。研精至理，状似离娄。口传甲乙，则以为义理。强指物类，状似有理。好说是非，则以为臧否。妄说是非，似明善否。讲目成名，则以为人物。强议贤愚，似明人物。平道政事，则以为国体，妄论时事，似识国体。犹听有声之类，名随其音。七者不能明，物皆随行而为之名，犹听猫音而谓之猫，听雀音而谓之雀，不知二虫竟谓何名也。世之疑惑，皆此类也。是以鲁国儒服者，众人皆谓之儒，立而问之，一人而已。夫名非实，用之不效。南箕不可以簸扬，北斗不可挹酒浆。故曰，名犹口进，而实从事退。众睹形而名之，故用而不验也。中情之人，名不副实，用之有效。真智在中，众不能见，故无外名而有内实。故名由众退，而实从事章，效立则名章。此草创之常失也。浅智无终，深智无始，故众人之察物，常失之于初。故必待居止，然后识之，视其所止，观其所居，而焉不知。故居，视其所安。安其旧者，敦于仁。达，视其所举。举刚直者，厚于义。富，视其所与。与严壮者，明于礼。穷，视其所为。为经术者，勤于智。贫，视其所取。取其分者，存于信。然后乃能知贤否。行此者贤，反此者否。此又已试，非始相也。试而知之，岂相也哉。所以知质，未足以知其略。略在变通，不可常准。且天下之人，不可得皆与游处。故视其外状，可以得一，未足尽知。或志趣变易，随物而化。是以世祖失之庞萌，曹公失之董卓。或未至而悬欲，或已至而易顾。李轶始专心于光武，终改顾于圣公。或穷约而力行，或得志而从欲。王莽初则布衣折节，卒则穷奢极侈。此又居止之所失也。情变如此，谁能定之。由是论之，能两得其要，是难知之难。既知其情，又察其变，故非常人之所审。

何谓无由得效之难？上材已莫知，已难识知。或所识者在幼贱之中，未达而丧。未及进达，其人已丧。或所识者未拔而先没。未及拔举，已先没世。或曲高和寡，唱不见赞。公叔座荐商鞅，而魏王不能用。或身卑力微，言不见亮。禽息举百里奚，首足皆碎。或器非时好，不见信贵。窦后方好黄老，儒者何由见进。或不在其位，无由得拔。卞和非因匠，所以抱璞泣。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。何武举公孙录，而为王氏所推。是以良材识真，万不一遇也。材能虽良，当遇知己。知己虽遇，当值明王。三者之遭，万不一会。须识真在位，识百不一有也。虽识己直，或不在位。以位势值可荐致之，宜十不一

合也。识己须在位，智达复须宜。或明足识真，有所妨夺，不欲贡荐。虽识辨贤愚而屈于妨夺，故有不欲。或好贡荐，而不能识真。在位之人，虽心好贤善，而明不能识。是故知与不知，相与分乱于总猥之中。或好贤而不识，或知贤而心妒，故用与不用，同于众总，纷然淆乱。实知者，患于不得达效。身无位次，无由效达。不知者，亦自以为未识。身虽在位，而不能识。所谓无由得效之难也。故曰知人之效，有二难。是以人主常当运其聪智，广其视听，明扬侧陋，旁求俊乂，举能不避仇讎，拔贤不弃幽隐，然后国家可得而治，功业可得而济也。

【大意】

了解人材而有效验有两种难处。其一，了解人的难处；其二，了解却无法举荐的难处。本来人的内心世界就很复杂，加之一般人的观察又不能全面把握，而评定标准又因人而异，所以很容易造成偏差。在了解了人物之后，所面临的举荐问题又会产生诸多困难。比如，有的曲高和寡，高声唱好，却不见颂扬；有的身世卑微，力量菲薄，入微言轻，不为人理解；有的举荐人不在其位，人材无以提拔……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故良材能遇到识别其真情的人，万人当中难有一个。所谓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，即如此。

释争第十二

贤善不伐，况小事乎。释忿去争，必荷荣福。

盖善以不伐为大。为善而自伐其能，众人之所小。贤以自矜为损。行贤而去自贤之心，何往而不益哉。是故舜让于德，而显义登闻。汤降不迟，而圣敬日跻。彼二帝虽天挺圣德，生而上哲，犹怀劳谦，疾行退下。然后信义登闻，光宅天位。郗至上人，而抑下滋甚。王叔好争，而终于出奔。此二大夫矜功陵物，或宗移族灭，或逃祸出奔。由此观之，争让之道，岂不悬欤。然则卑让降下者，茂进之遂路也。江海所以为百谷王，以其处下也。矜奋侵陵者，毁塞之险途也。兕虎所以攫牢檻，以其性犷噬也。是以君子举不敢越仪准，志不敢陵轨等。足不苟蹈，常怀退下。内勤己以自济，外谦让以敬惧。独处不敢为非，出门如见大宾。是以怨难不在于身，而荣福通于长久也。外物不见伤，子孙赖以免。彼小人则不然。矜功伐能，好以陵人，初无巨细，心发扬以陵物。是以在前者人害之，矜能奔纵，人情所害。有功者人毁之，恃功骄盈，人情所毁。毁败者人幸之。及其覆败，人情所幸。是故并辔争先，而不能相夺。小人竞进，智不相过，并驱争险，更相蹈籍。两顿俱折，而为后者所趋。中道而毙，后者乘之，譬兔殒犬疲，而田父收其功。由是论之，争让之途，其别明矣。君子尚让，故涉万里而途清。小人好争，足未动而路塞。然好胜之人，犹谓不然。贪则好胜，虽闻德让之风，意犹昧然，乃云古人让以得，今人让以失，心之所是，起而争之。以在前为速锐，以处后为留滞，故行坐汲汲，不暇脂车。以下众为卑屈，以蹶等为异杰，苟矜起等，不羞负乘。以让敌为迴辱，以陵上为高厉。故赵穿不顾元帅彘子以偏师陷。是故抗奋遂往，不能自反也。譬虎狼食生物，遂有杀人之怒。夫以抗遇贤，必见逊下。相如为廉颇逡巡，两得其利。以抗遇暴，必构敌难灌夫不为田蚡持下，两得其尤。敌难既构，则是非之理必溷而难明。俱自是而非彼，谁明之耶。溷而难明，则其与自毁何以异哉？两虎共斗，小者死，大者伤，焉得而两全。且人之毁己，皆发怨憾而变生衅也。若本无憾恨，遭事际会，亦不致毁害。必依托于事，饰成端末。凡相毁谤，必因事类而饰成之。其于听者虽不尽信，犹半以为然也。由言有端角，故信之者半。己之校报，亦又如之。复当报谤，为生翹尾。终其所归，亦各有半。信著于远近也。俱有形状，不知其实是以近远之听，皆半信于此，半信于彼。然则交气疾争者，为易口而自毁也。己说人之瑕，人亦说己之秽，虽詈人，自取其詈也。并辞竞说者，为贷手以自毁。辞忿则力争，己既毁人，人亦毁己，此其为借手以自毁。为惑缪岂不甚哉？借手自毁，借口自詈，非惑如何。然原其所由，岂有躬自厚责，以致变讼者乎？己能自责，人亦自责，两不言竞，变讼何由生哉。皆由内恕不足，外望不已。所以争者，由内不能恕己自责，而外望于人不已也。或怨彼轻我，或疾彼胜己。是故心争终无休已。夫我薄而彼轻之，则由我曲而彼直。曲而见轻，固其宜矣。我贤而彼不知，则见轻非我咎也。亲反伤也，固其宜矣。若彼贤而处我前，则我德之未至也。德轻在彼，固所宜也。若德均而彼先我，则我德之近次也。德均年次，固其常矣。夫何怨哉？且两贤未别，则能让者为隗矣。材均而不争优劣，众人善其让。争隗未别，则用力者为惫矣。隗等而名未别，众人恶其斗。是故蔺相如以回车决胜于廉颇，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。此二贤者，知争途不可由，故回车退避，或酒炙迎送，故廉贾肉袒，争尚泯矣。物势之反，乃君子所谓道也。龙蛇之蛰以存身，尺

螻之屈以求伸，虫微物耳，尚知蟠屈，况于人乎。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，故含辱而不辞。韩信屈于跨下之辱。知卑让之可以胜敌，故下之而不疑。展喜犒齐师之谓也。及其终极，乃转祸而为福，晋文避楚三舍，而有城濮之勋。屈仇而为友。相如下廉颇而为刎颈之交。使怨仇不延于后嗣，而美名宣于无穷。子孙荷其荣荫，竹帛纪其高义。君子之道岂不裕乎。若偏急好争，则身危当年，何后来之能福。且君子能受纤微之小嫌，故无变斗之大讼。大讼起于纤芥，故君子慎其小。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，终有赫赫之败辱。小人以小恶为无伤而不去，故罪大不可解，恶积不可救。怨在微而下之，犹可以为谦德也。怨在纤微，则谦德可以除之。变在萌而争之，则祸成而不救矣。涓涓不息，遂成江河，水漏覆舟，胡可救哉。是故陈馥以张耳之变，卒受离身之害。思复须臾之忿，忘终身之恶，是以身灭而嗣绝也。彭宠以朱浮之郤，终有覆亡之祸。恨督责之小故，违终始之大计，是以宗夷而族覆也。祸福之机，可不慎哉！二女争桑，吴楚之难作。季郈斗难，鲁国之衅作。可不畏欤，可不畏欤。是故君子之求胜也，以推让为利锐，推让所往，前无坚敌。以自修为棚橰。修己以敬，物无患者。静则闭嘿泯之玄门，动则由恭顺之通路。时可以静，则重闭而玄嘿。时可以动，则履正而后进。是以战胜而争不形。动静得节，故胜无与争，争不以力，故胜功见耳。敌服而怨不构。干戈不用，何怨构之有。若然者悔憾不存于声色，夫何显争之有哉。色貌犹不动，况力争乎。彼显争者，必自以为贤人，而人以为险诋者。以己为贤，专固自是，是己非人，人得不争乎。实无险德，则无可毁之义。若信有险德，又何可与讼乎？险而与之讼，是桤兕而攫虎，其可乎？怒而害人，亦必矣。《易》曰：“险而违者，讼。讼必有众起。”言险而行违，必起众而成讼矣。《老子》曰：“夫惟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。以谦让为务者，所往而无争。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。由于争途者，必覆轮而致祸。

是以越俗乘高，独行于三等之上。何谓三等？大无功而自矜，一等。空虚自矜，故为下等也。有功而伐之，二等。自伐其能，故为中等。功大而不伐，三等。推功于物，故为上等。愚而好胜，一等。不自量度，故为下等。贤而尚人，二等。自美其能，故为中等。贤而能让，三等。归善于物，故为上等。缓己急人，一等。性不恕人，故为下等。急己急人，二等。褊戾峭刻，故为中等。急己宽人，三等。谨身恕物，故为上等。凡此数者，皆道之奇，物之变也。心不纯一，是为奇变。三变而后得之，故人莫能远也。小人安其下等，何由能及哉。夫唯知道通变者，然后能处之。处上等而不失者也。是故孟之反以不伐，获圣人之誉。不伐其功，美誉自生。管叔以辞赏，受嘉重之赐。不贪其赏，嘉赐自致。夫岂诡遇以求之哉，乃纯德自然之所合也。岂故不伐，辞赏，诡情求名耶，乃至直发于中，自与理会也。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，故功一而美二。自损而行成名立。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，故一伐而并失。自伐而行毁名丧。由此论之，则不伐者，伐之也。不争者，争之也。不伐而名章，不争而理得。让敌者，胜之也。下众者，上之也。退让而敌服，谦尊而德光。君子诚能睹争途之名险，独乘高于玄路，则光辉焕而日新，德声伦于古人矣。避忿肆之险途，独逍遥于上等，远燕雀于啁啾，足鸣凤于玄旷，然后德辉耀於来今，清光侔于往代。

【大意】

一个有成就的人（即人材）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应该做到“不争”、“不伐”，即不争强好胜大出风头。而要时刻谦让以为本。文章把人分为三等，

没有功劳却自恃有功，一等；虽有功劳却骄傲自满，二等；功绩最大却不自夸，三等。谦让并不能埋没人的才华，《老子》说“夫惟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，是有深刻道理的。

总之，《人物志》突出强调了一点，即聪明睿智是人材的核心素质，但在“德”的修养方面，必须以“平淡”为基础，如此才可能成为德才兼备之人，才可能成就大事业。

名著通览

朱熹（1130—1200），字元晦，一字仲晦，号晦庵，别称紫阳，徽州婺源（今属江西）人，侨寓建阳（今属福建）。

朱熹曾登绍兴进士第，历事高、孝、光、宁四朝。凡所奏闻，皆正心、诚意、齐治、平均之道。累官转运副使、焕章阁待制、秘阁修撰，终宝文阁待制。庆元年间致仕，不久卒。嘉泰初谥文，宝庆中赠太师，追封信国公，改徽国。

朱熹的理学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地位。他本人也备受历代统治者的尊崇，淳祐时从祀孔庙，清康熙中升位为“十哲”之一。

《朱文公政训》是朱熹与门人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之一，虽署名为朱熹著，实则成于众弟子之手。

朱熹曾经做过南康等地的地方官，有相当丰富的为政经验。《政训》中的言论都是朱熹从自己的从政经历出发，对当时治国安民中存在的若干问题，提出自己的看法。它不仅部分地反映了朱熹的政治思想，而且，由于朱熹本人地位的缘故，所以对当时及以后的官吏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。

朱熹强调为官者要有仁爱之心，要心度大方，要以仁心感化庶民。

当官者要注意民事。“平易近民，为政之本”，要以民事为重，军政次之。

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，“临民以宽，待士以礼，驭吏以严。”

为政要令行禁止。号令要明，刑罚也不能弛。要以严为本，以宽济之。

对官吏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。要大公无私，不能存有个人杂念。要勤于政务，不能偷懒，对于已了和未了之事，要做记录，以便心中有数，还要定期清理，不拖沓延误。官吏本身须是“晓事底人”，即明白事理，精明能干。要“自高一着”，比部属更有胆略和能力，方不致为属下所左右。还要多次亲自动手处理实际问题，“熟后自会”，从实际工作中摸索出方法，积累经验。

对于部属，要立下规章制度加以约束，如针对拖拉作风，要限定界限，逾期严究。

全文

论世事曰：须是心度大方，包裹得过，运动得行。

今世士大夫，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，挨得时进且过，上下相咻以勿生事，不要十分理会事，且凭鹘突；才理会得分明，便做官不得。有人少负能声，及少经挫抑，却悔其太惺惺了了，一切刑方为圆，随俗苟且，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。当官者，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、不治事为得策。曲直在前，只不理睬，庶几民自不来，以此为止讼之道。民有冤抑，无处申诉，只得忍遏；便有讼者，半年周岁不见消息，不得予决，民亦只得休和，居官者遂以为无讼之可听。风俗如此，可畏可畏！

被几个秀才在这里翻弄那吏文，翻得来难看。吏文只合直说，其事是如何，条贯是如何，使人一看便见方是。今只管弄闲语，说到紧要处，又只恁地带过去。

因论郡县政治之乖曰：民虽众，毕竟只是一个心，甚易感也。

吴英云：政治当明其号令，不必严刑以为威。曰号令既明，刑罚亦不可弛。苟不用刑罚，则号令徒挂墙壁尔。与其不遵以梗吾治，曷若惩其一以戒百？与其覆实检察于其终，曷若严其始而使之无犯？做大事，岂可以小不忍为心？

吾辈今经历如此，异时若有尺寸之柄，而不能为斯民除害去恶，岂不诚可罪耶？某尝谓今之世姑息不得，直须与他理会，庶几善弱可得存立。

或问：为政者当以宽为本，而以严济之？曰：某谓当以严为本，而以宽济之。《曲礼》谓“浝官行法，非礼威严不行。”须是令行禁止，若曰令不行、禁不止，而以是为宽，非也！

今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，某谓坏了这“宽”字。

为政，如无大利害，不必议更张，则所更一事未成，必哄然成纷扰，卒未已也。至于大家，且假借之，故子产书引郑曰：“安定国家，必大焉先。”

问：为政更张之初，莫亦须稍严以整齐之否？曰：此事难断定说，在人如何处置，然亦何消要过于严？今所难者是难得晓事底人，若晓事底人历练多，事才至面前，他都晓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应之，人自然畏服。今人往往过严者，多半是自家不晓，又虑人欺己，又怕人慢己，遂将大拍头去拍他，要他畏。

问治乱之机，曰：今看前古治乱，那里是一时做得？少是四、五十年，多是一、二百年酝酿方得如此。遂俛首太息。

蜀远朝廷万有余里，择帅须用严毅，素有威名，足以畏压人心，则喜乱之徒不敢作矣。

今之法家，惑于罪福报应之说，多喜出人罪以求福报。夫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幸免，是乃所以为恶尔，何福报之有？《书》曰：“钦哉钦哉，惟刑之恤哉！”所谓钦恤者，欲其详审曲直，令有罪者不得免，而无罪者不得滥刑也。今之法官，惑于钦恤之说，以为当宽人之罪而出其死，故凡罪之当杀者，必多为可出之涂以俟奏裁，则率多减等，当斩者配，当配者徒，当徒者杖，当杖者笞，是乃卖弄条贯、舞法而受赃者耳，何钦恤之有？罪之疑者从轻，功之疑者从重。所谓疑者，非法令之所能决，则罪从轻而功从重，惟此一条为然耳，非谓凡罪皆可以从轻，而凡功皆可以从重也。今之律令亦有此条，谓法所不能决者，则俟奏裁。今乃明知其罪之当死，亦莫不为可生

之涂以上之，惟寿皇不然，其情理重者皆杀之。

杨通老相见，论纳米事。先生曰：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：州县多取于民，监司知之当禁止，却要分一分，此是何义理？又论广西盐曰：其法亦不密。如立定格，六斤不得过百钱，不知去海远处，搬担所费重，此乃许子之道，但当任其所之，随其所向，则其价自平。天下之事，所以可权衡者，正谓轻重不同，乃今一定其价，安得不弊？又论汀寇止四十人，至调泉、建、福三州兵，临境无寇，须令汀守分析。先生曰：才做从官，不带职出，便把这事做欠阙。见风吹草动便喜，做事不顾义理，只是简利多害少者为之。今士大夫皆有此病。

今赈饥之事，利七而害三，则当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利。然必欲求全，恐并与所谓利者失之矣。

直卿言辛幼安帅湖南，赈济榜文只用八字，曰：“劫禾者斩，闭籴者配。”先生曰：这便见得他有才，此八字若做两榜便乱道。又曰：要之，只是粗法。

因论保伍法，或曰此诚急务，曰：固是。先王比閭保伍之法，便是此法，都是从这里做起，所谓分数是也。兵书云：御众有多寡，分数是也。看是统驭几人，只是分数明，所以不乱。王介甫锐意欲行保伍法，以去天下坐食之兵，不曾做得成。范仲达为袁州万载令，行得保伍极好。自来言保伍法无及之者。此人心力，行得极整肃，虽有奸细，更无所容。每有疑似无行止人，保伍不敢著，互相传送至县；县验其无他，方令传送出境。讫任满，无一寇盗。顷张定叟知袁州，托其询问，则其法已亡，偶有一县吏，略记大概。

某《保甲草》中所说，县郭四门外，置隅官四人，此最紧要，盖所以防卫县郭以制变。县有官府狱讼仓库之属，须是四面有个防卫始得，一个隅官须各管得十来里方可。诸乡则只置弹压之类，而不复置隅官，默寓个大小相维之意于其间。又后面子弟一段，须是著意理会。这个子弟真个要他用，非其他泛泛之比，须是别有个拔擢旌赏以激劝之乃可。此等事难处，须是理会，教他整密，无些罅缝方可。

今日言事，欲论一事一人，皆先探上意如何，方进文字。

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，其次则便是军政。今人都不理会。

谓李思永曰：衡阳讼牒如何？思永曰：无根之讼甚多。先生曰：与他研究道理，分别是非曲直，自然讼少。若厌其多，不与分别，愈见事多。

官无大小，凡事只是一个公。若公时，做得来也精采，便若小官，人也望风畏服；若不公，便是宰相，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稍。

人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职者，是无那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。

尝叹州县官碌碌，民无所告诉，兼民情难知，耳目难得，其人看来如何明察，亦多有不知者。以此观之，若是见得分明，决断时岂可使有毫发不尽？又叹云：民情难知如此，只是将什么人为耳目之寄！

如看道理，辨是非，须是自高一着。今做官人几时个个是阉冗人？多是要立作向上；那个不说道先着馭吏？少间无有不拱手听命于吏者。这只是自家不见得道理，事来都区处不下，吏人弄得惯熟，却见得高于他，只得委任之。

胡致堂言吏人不可使他知我有恤他之意，此说极好。小处可恤，大处不可恤。又曰：三、五十钱底可恤。若有人来理会，亦须治他。

某与诸公说下稍去仕宦不可不知，须是有旁通历，逐日公事开项逐一记。了即勾了，未了须理会教了，方不废事。

当官文书簿历，须逐日结押，不可拖下。

廖德明赴潮倅告别，临行，求一安乐法。曰：圣门无此法。

人只任闲散不可，须是读书。又谓闲散是虚乐，不是实乐。

因说僧家有规矩严整，士人却不循礼，曰：他却是心有用处。今士人虽有好底。不肯为非，亦是他资质偶然如此，要之其心实无所用，每日闲慢时多。

问：精神收敛便昏是如何？曰：也不妨。又曰：昏毕竟是慢。如临君父渊崖，必不如此。又曰：若倦，且磕睡些时无害。问：非是读书过当，倦后如此，是才收敛来稍久便困。曰：便是精神短后如此。

今人掀然有飞扬之心，以为治国平天下如指诸掌，不知自家一个身心都安顿未有下落，如何说功名事业？怎生治人？古时英雄豪杰不如此。张子房不问着他不说，诸葛孔明甚么样端严？今学为英雄之学，务为趺弛豪纵，全不检点身心。某须是事事从心上理会起，举止动步，事事有个道理。一毫不然，便是欠阙了他。道理固是，天下事无不当理会，只是有先后缓急之序，须先立其本，方以次推及其余。

郭德元告行，先生曰：人若于日间，闲言语省得一两句，闲人客省见得一两人也济事。若浑身都在闹场中，如何得进？

问气弱胆小之病，曰：只去做工夫，到理明而气自强，胆自大矣。

舜弼游屏山归，因说园甚佳，曰：园虽佳而人之志则荒矣。

平易近民，为政之本。

今之赋轻处更不可重，只重处减似那轻处可矣。

朋友言某官失了税簿，先生曰：此岂可失了？此是根本，无这个后如何稽考？所以《周官》建官，便皆要那史。所谓史，便是掌管那簿底。

问应事心便去了，曰：心在此应事，不可谓之出在外。

问事事当理则不必能容，能容则必不能事事当理，曰：容只是宽平不狹。如这个人当杀则杀之，理合当杀，非是自家不容他。

天下万事，都是合做底，而今也不能杀定合做甚底事；对贤教人，也不曾杀定教人如何做。只自家日用间看甚事来，便做工夫。今日一样事来，明日又一样事来，预定不得。若指定是事亲，而又有事长；指定是事长，而又有事君。只日用间看有甚事来，便做工夫。

某在漳州，有讼田者契数十本，自崇宁起来事甚难考，其人将正契藏了，更不可理会。某但索四畔众契比验，四至昭然，及验前后所断，情伪更不能逃，理亦如是如此。

问：作事多始锐而终辍，莫是只为血气使？曰：虽说要义理之气。然血气亦不可无。《孟子》气体之充，但要以义理为主耳。

德粹问：在四明守官要顾义理，才到利害重处则顾忌，只是拚一去如何？先生曰：无他，只是志不立，却随利害走了。

人在官固当理会官事，然后做得官好。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，须讲学立大本，则有源流。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，今日做得一件，明日又做一件，却穷了。德粹云：初到明州，问为学于沈叔晦，叔晦曰：若要读书，且于婺源山中坐。既在四明，且理会官事。先生曰：县尉既做了四年，滕德粹元不曾理事。

尧卿问：事来断制不下，当何以处之？曰：便断制不得，也着断制，不成掉了？又问：莫须且随力量做去？曰：也只得随力量做去。又问：事有至

理，理有至当，十分处今已看得七、八分，待穷来穷去，熟后自解，到那分数足处？曰：虽未能从容，只是熟后自会。只是熟，只是熟！

胡叔器问：每常多有恐惧，何由可免？曰：须是自下工夫，看此事是当恐惧不当恐惧。《遗书》云：治怒难，治惧亦难，克己可以治怒，明理可以治惧。若于道理见得了，何惧之有？

一日谓鲁可几曰：事不要察取尽。

因人之昏弱而箴之曰：人做事全靠这些子精神。

或问人因欲事事物物理会，然精神有限，不解一一都理会得，曰：固有做不尽底，但立一个纲程，不可先自放倒也。须静着心，实着意，沉潜反复，终久自晓得去。

郑子上问：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矫激之名，莫学颜子之浑厚否？曰：浑厚自是浑厚，今人只学一般回互底心意，不是浑厚。浑厚是可做便做，不计利害之谓。今却是计利害太甚，做成回互耳，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。如陈仲弓送宦者葬，所谓有仲弓之志则可，无仲弓之志则不可。因说东汉事势，士君子欲全身远害，则有不仕而已。虽出仕，遇宦官纵横，如何畏祸，不与他理会得？若未免仕，只得辞尊居卑，辞富居贫。若既要为大官，又要避祸，无此理。

宋莒公曰：应从而违，堪供而阙，此六经之亚文也，谓子不从父不义之命，及力所不能养者，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。义当从而不从，力可供而不供，然后坐以不孝之罪。

某作县，临行，请教于友人，友人曰：张直柔在彼，每事可询访之。某人到官，忽有旨令诸县造战船，召匠计之，所费甚巨。因忆临行请教之语，亟访策于张，张曰：此事甚易。可作一小者，计其丈尺，又广狭长短，即是推之，则大者可见矣。遂如其语为之，比成推算，比前所计之费减十之三四。其后诸县皆重有科敷，独是邑不扰而办。后其人知绍兴府，太后山陵被旨令应副钱数万，结砖为墙。其大小厚薄，呼砖匠于后园，依样造之，会其直比抛降之数减数倍，遂申朝廷，乞绍兴自认砖墙。正中宦者欺弊，遂急沮其请，只令绍兴府应副钱，不得干预砖墙事。

李椿年行经界，先从他家田上量起。今之辅弼，能有此心否？

王詹事守泉。初到任，会七邑宰劝酒，历告之以爱民之意，出一绝云：九重天子爱民深，令尹宜怀恻怛心。今日黄堂一杯酒，使君端为庶民斟。七邑宰皆为之感动。故吏民无人不畏爱，去之日，父老儿童攀辕者不计其数，公亦为之垂泪。至今泉人犹怀之如父母。

辛幼安为闽宪，问政，答曰：临民以宽，待士以礼，驭吏以严。恭甫再为潭帅，律己愈谨，驭己愈严。某谓如此方是。

吴公路作《南剑天柱滩记》曰：事如大小，为之必成；害无大小，除之必去。此是其志。

龙泉簿范伯崇寄书来云：今日气象，官无大小，皆难于有为，盖通身是病，无下药处耳，安得大贤君子正其根本，使万目具举，吾民得乐其生耶？严陵之政，远近能言之，盖恻怛之心发于诚然，加之明敏，何事不立？

主簿就职内大有事，县中许多簿书皆当管。某向为同安簿，许多赋税出入之簿，逐日点对金押，以免吏人作弊。时某人为泉倅，簿书皆过其目，后归乡与说及，亦懵不知。他是极仔细官人，是时亦只恁呈过。

因说赈济曰：平居须是修陂塘始得。到得旱了，赈济委无良策，然下手

得早，亦得便宜。在南康时，才见旱，便划刷钱物，库中得三万来贯，准氍余料，添支官兵，却去上供钱内借三万贯余米，赈余早时余，得却余钱还官中解发，是以不阙事。旧来截住客船余三分米，至于客船不来。某见官中及上户自有米，遂出榜放客船米自，便不余客船米，又且米价不甚贵。又曰：悔一件事，南康煞有常平米，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时余，米价甚贵。在法不得减元价，遂不曾赍，当时只好赍了，上章待罪，且得为更新米一番，亦缘当时自有米，所以不动此米，久为南康官吏之害。

因论常平仓曰：某自典二州，知常平之弊，如此更不敢理会着。南康自有五、六万硕，漳州亦六、七万硕，尽是浮埃空壳，如何敢挑动？这一件事不知做甚合杀？某在浙东常奏云：常平仓与省仓不可相连，须要东西置立，令两仓相去远方可。每常官吏点检省仓，则挂省仓某号牌子；检点常平仓，则挂常平仓牌子。只是一个仓，互相遮瞒。今所在常平仓都教司法管，此最不是。少间太守要侵支，司法如何敢拗？通判虽管常平，而其职实管于司法，又所在通判，太率避嫌，不敢与知州争事，韩文公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。且如经总制钱、牙契钱、倍契钱之类，被尽知州瞒朝廷夺去，更不敢争。

与陈尉说治盗事。因曰：凡事须仔细体察，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处，防备到人所防备不到处，方得无事。又曰：凡事须是小心寅畏，若恁地觊心驾去不得。又曰：某尝作郡来，每见有贼发，则惕然皇恐，便思自家是长民之官，所以致此是何由？遂百种为收捉，捉得便自欢喜，不捉得则终夜皇恐。

因说郑惠叔爱惜官钱，云：某见人将官钱胡使，为之痛心。两为守皆承弊政之后，其所用官钱，并无分明。凡所送遗，并无定例，但随意所向为厚薄。问胥，皆云有时这般官员过往，或十千，或五千，后番或是这样，又全不送，白休了。某遂云：如此不得朝廷有个公库在这里？若过往官员，当随其高下多少与之，乃是公道，岂可把为自家私恩？于是立为定例，看甚么官员过此，便用甚么例送与之，却得公溥。后来至于凡入广诸小官，如簿尉之属，个个有五千之助，觉得意思尽好。

问：今之神祠，无义理者极多，若当官处于极无义理之神祠，虽系勅额，凡祈祷之类，不往可否？曰：某当官所至，须理会一番。如仪案所具，合祈祷神示；有无义理者，使人可也。

马子严见，言近有人作假书请托公事者，先生曰：收假书而不见下书之人，非善处事者。旧见吴提刑公路当官，凡下书者须令当听投下，却将书于背处观之，观毕，方发付其人，令等回书。前辈处事详密如此。又某当官时，有人将书来者，亦有法以待之。须是留其人吃汤，当面拆书，若无他，方令其去。

而今救荒甚可笑。自古救荒只有两说：第一是感召和气以致丰穰，其次只有储蓄之计。若待他饿时理会，更有何策？东边遣使去赈济，西边遣使去赈济，只讨得逐州几个紫绶册子来，某处已如何处置、已如何经画，原无实惠及民。或问先生向来救荒如何？曰：只是讨得紫绶册子，更有何策？

赈济无奇策，不如讲水利，到赈济时成甚事？向在浙东，疑山阴、会稽二县刷饥饿的人少，通判郑南再三云数实，及仔细刷起三倍。

绍兴时去得迟，已无擘画，只依常行，先差一通判抄割城下两县饥民。其人不留意，只抄得四万来人，外县却抄得多，遂欲治之而不曾，却托石天民重抄，得八万人，是时已迟，天民云：甚易！只关集大保长，尽在一寺，令供出人之贫者。大保长无有不知数目，便办却分作数等赈济赈赍。其初令

画地图，量道里远近，就僧寺或庄宇，置柴米所于门首，立木窗，关防再入之人。

先生语次问浙东旱，可学云：浙东民户歌先生之德，先生曰：向时到部，州县有措置，亦赖朝廷应副得以效力，已自有名无实者多。因曰：向时浙东先措置分户高下出米，不知有米无米不同，有徐木者献策，须是逐乡使相推排有米者，时以事逼不曾行，今若行之，一县甚易。大抵今时做事，在州郡已难，在监司尤难，以地阔远，动成文具。惟县令于民亲，行之易。计米之有无，而委乡之聪明、诚信者处之。聪明者人不能欺，诚信者人不忍欺。若昏懦之人，为人所欺，谲诈之士，则务欲容私，此大不可。

建阳簿权县，有妇人，夫无以赡父母，欲取以归，事到官，簿断听离。致道深以为不然，谓夫妇之义，岂可以贫而相弃，官司又岂可遂从其请？曰：这般事都就一边看不得。若是夫不才，不能育其妻，妻无以自给，又奈何？这似不可拘以大义。只怕妻之欲离其夫，别有曲折，不可不根究。直卿云其兄任某处，有继母与父不恤前妻之子，其子数人，贫窶不能自活，哀鸣于有司，有司以名分不便，只得安慰而遣之，竟无如之何。曰：不然。这般所在，当以官法治之也，须追出后母，责治戒励。若更离间前妻之子，不存活他，定须痛治。因云昔为浙东仓时，绍兴有继母与夫之表弟通，遂为接脚夫，擅用其家业，恣意破荡，其子不甘，来诉。初以其名分不便，却之，后赶至数十里外，其情甚切，遂与受理。委杨敬仲，敬仲深以为子诉母不便，某告之曰：曾与其父思量否？其父身死，其妻辄弃背与人私通而败其家业，其罪至此，官司若不与根治，则其父得不衔冤于地下乎？今官司只得且把他儿子顿在一边。渠当时亦以为然。某后去官，想成休了初追之急，其接脚夫即赴井，其有罪盖不可掩。

郡中出公牒，延郡士黄知录等入学，而张教授与旧职事沮格，至是先生下学，变色厉词曰：教授分教一邦，合当自行规矩，而今却容许多无行之人，争讼职事，都不成学校。士人先要识个礼义廉退之节，若寡廉鲜耻，虽能文要何用？

诣学学官以例讲书，谓诸生曰：且须看他古人道理意思如何，今却只做得一篇文字，读了望他古人道理意思处，都不曾见。

问先生禁漳民礼佛朝岳，皆所以正人心也。曰：未说到如此，只是男女混淆，便当禁约尔。侍坐诸公各言诸处浮巫瞽惑等事，先生蹙额嗟叹而已。因举江西有玉隆万寿宫、太平兴国宫，每岁两处朝拜，不惮远近奔趋，失其本心，一至于此，曰：某尝见其如此，深哀其愚。上升一事，断无此理，岂有许多人一日同登天，自后又却不见一个登天之人？

郑湜问戢盗曰：只是严保伍之法。郑之：保伍之中，其弊自难关防，如保头等易得挟势为扰。曰：当今逐处乡村，举众有推服底人为保头，又不然，则行某漳州教军之法，以戢盗心，这是已试之效，因与说某在漳州，初到时，教习诸军弓射等事，皆无一人能之。后分许多军作三番，每月轮番入教场。挽弓及等者有赏，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，及等则止，终不及则罢之。两月之间，翕然都会射，及上等者亦多。

经界科半年便都了。以半年之劳，而革数百年之弊，且未说到久，亦须四、五十年，未便卒坏，若行，则令四县特作四楼，以贮簿籍，州特作一楼以贮四县之图帐，不与他文书混。阖郡皆曰不可者，只是一样人田多税少，便造说吓唬以为必有害无利，一样人有惮劳懒做事，却被那说所诬，遂合辞

以为不可，其下者因翕然从之。今之为县，真有爱民之心者十人，则十人以经界为利；无意于民者十人，而十人以经界为害。今之民，只教贫者纳税，富者自在收田置田，不要纳税，如此则人便道好，更无些事不顺，他便称颂为贤守。

因论漳、泉行经界事，假未得人势亦着做。古人立事，亦硬当着做，以死继之而已。韩魏公作相，温公在言路，凡事颇不以魏公为然，魏公甚被他激挠。后来温公作魏公祠堂记，却说得魏公事，分明见得魏公不可及处，温公方心服他。记中所载魏公之言曰：凡为人臣者，尽力以事君，死生以之，顾事之是非何如耳，至于成败，天也，岂可豫忧其不成，遂辄不为哉？公为此言时，乃仁宗之末、英宗之初，盖朝廷多故之时也。

客说社仓讼事，曰：如今官司鹘突，多无理会，不知莫办。因说如今委送事，不知属官能否，胡乱送去，更无分晓了绝时节。某在潭州时，州中僚属，朝夕相见，却自知得分晓，只县官无由得知。后来区处，每月版帐钱，令县官逐人轮番押来，当日留住，试以公事。又怕他鹘突写来，却与立了格式，云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；某人于某年月日，于某处理某事，某官如何断一；又于某时，某再理，某官如何断一；某今看详某事理如此，于条合如何结绝。如此，人之贤否，皆不得而稳。

今人狱事，只管理会要从厚，不知不问是非善恶，只务从厚，岂不长奸惠恶？大凡事付之无心，因其所犯，考其实情，重轻厚薄，付之当然可也，若从薄者固不是，只云我只要从厚，则此病所系亦不轻。某在长沙治一姓张人，初不知其恶如此，只因所犯追来，久之乃出头，适有大赦，遂且与编管。后来闻得此人凶恶不可言，人只是平白地打杀不问，门前有一木桥，商贩者自桥上过，若以柱杖拄其桥，必捉来吊缚，此等类甚多，若不痛治，何以惩戒？公等他日仕宦，不问官大小，每日词状须置一簿，穿字号，录判语；到事亦作一簿，发放文字亦作一簿，每日必勾了号，要一日内许多事都了方得。若或做不办，又作一簿记未了事，日日检点了，如此方不被人瞒了事。今人只胡乱随人来理会，来与不来都不知，岂不误事？

先生爱说“恰好”二字，云：凡事自有恰好处。

先生每与学者云：凡事无许多闲劳扰。

有亲戚托人求举，先生曰：亲戚固是亲戚，然荐人于人，亦须是荐贤始得，今乡里平平等人，无可称之实，某部不与发书悞。

择之劳先生人事之繁，答曰：大凡事，只得耐烦做将去，才起厌心便不得。

先生一日说及受赃者，怒形于言曰：某见此等人，只与大字面配去。徐又曰：今说公吏不合取钱，为知县者自要钱矣。节节言之，为之吁叹。

侍先生到唐石。唐石有社仓，往往支发不时，故被人来告，先生云：救弊之道，在今日极是要严。不严，如何得实惠及此等细民？

道夫言察院黄公钹刚正，人素畏惮。其族有纵恶马踏人者，公治之急，其人避之惟谨，公则斩其马足以谢所伤。先生曰：某南康临罢，有跃马于市者，踏一小儿将死，某时在学中，令送军院，次日以属知录，晚过廨舍，知录云：早上所喻已拷治如法。某既而不能无疑。回至军院，则其人冠履俨然，初未尝经拷掠也，遂将吏人并犯者讯之，次日吏人杖脊勒罢。偶一相识云：此是人家子弟，何苦辱之？某曰：人命所系，岂可宽弛？若云子弟得跃马踏入，则后日将有甚于此者矣。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，保佑善良，抑挫豪横，

乃其职也。纵而不问，其可得耶？后某罢，诸公相饯于白鹿，某为极口说西铭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”一段。今之为秀才者便主张秀才，为武官者主张武官，为子弟者便主张子弟，其所陷溺，一至于此！

因说慢令致期谓之贼，曰：昔在同安作簿时，每点追税，必先期晓示。只以一幅纸截作三片，用小榜遍贴，云本厅取几日点追甚乡分税，仰人乡户司知委。只如此，到限日近时，纳者纷纷然，此只是一个信而已。如或违限遭点，定断不恕，所以人怕。

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，如康贞观、开元都无文章，及韩昌黎、柳河东以文显，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。汪圣锡云：国初制诏，虽麓却甚好。又如汉高八年诏与文帝即位诏，只三数句。今人敷衍许多，无过只是此个柱子。

杨通老问赵守断人立后事错了，人无所诉。曰：理却是心之骨，这骨子不端正，少间万事一齐都差了。不知人心如何恁地这般都是要自用，不肯分委属官，所以事丛杂，处置不暇，胡乱断去。在法，属官自合每日到官长处共理会事，如不至者自有罪。今则属官虽要来，长官自不要他来，他也只得休，这般法意是多少好？某尝说或是作县，看是状牒如何烦多，都自有个措置。每听词状，集属官都来，列位于厅上，看有多少，均分之，各自判去。若是眼前易事，各自处断；若有可疑等事，便留在，集众较量断去，无有不当，则狱讼如何会壅？此非独为长官者省事，而属官亦各欲自效兼是，如簿尉等初官，使之决狱听讼得熟，是亦教诲之也。某在漳州，丰宪送下状如雨，初亦为随手断几件，后觉多了，恐被他压倒了，于是措置几只橱子，在厅上分了头项，送下讼来，即与上簿合索案底索自入一厨，人案已足底，自入一厨。一日集诸同官，各分几件去定夺，只于厅两边设幞位，令逐项叙来历，末后拟判。俟食时即就郡厨办数味，饮食同坐，食讫，即逐人以所定事较量。初间定得几个来，自去做文章，都不说着事情。某不免先为画样子，云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状系某事一；甲家于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计几项，乙家于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计几项，逐项次第写令状明一；甲家如何因甚么事争起到官，乙家如何来解释互论，甲家又如何供对，已前事分明了一；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断一；某年某月某日家于某官番诉，某官又如何断，以后几经番诉并画一。写出后面，却点对以前所断当否。或有未尽情节，拟断在后，如此了却，把来看中间有拟得是底，并依其所拟断决，合追人便追人，若不消追人，便只依其所拟，回申提刑司去；有拟得未是底，或大事可疑，却合众商量，如此事都了，并无壅滞。杨通老云：天下事体，固是说道当从原头理会来，也须是从下面细处理会将上始得。曰：固是。如做监司只管怕讼多，措置不下，然要省状也不得，若不受词讼，何以知得守令政事之当否，全在这里见得，只如入建阳，受建阳民户讼，这个知县之善恶便见得。如今做守令，其弊百端，岂能尽防？如胥吏沉滞公事，邀求于人，人知可恶，无术以防之，要好在严立程限他，限日到，自要苦苦邀索不得，若是做守令，有可以白干沉滞底事，便是无头脑，须逐事上簿，逐事要了始得。某为守，一日词诉，一日着到，合是第九日亦词讼，某却罢了此词讼，明日是休日，今日便刷起，一句之内有未了事，一齐都要了。大抵做官，须是令自家常闲，吏胥常忙，方苦得。自家被文字来丛了，讨头不见，吏胥便来作弊。做官须是立纲纪，纲纪既立，都自无事。如诸县发簿历到州，在法本州点对，自有限月：如初间是本州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，却交过通判审计司亦有五日限。今到处并不管着限日，或迟延一月，或迟延两三月，以邀索县道，直待计囑满

其所欲，方与呈州。初过磨算司使一番钱了。到审计司又使一番钱，到倅厅发回呈州呈覆吏人，又要钱。某曾作簿，知其弊，于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。他这般法意甚好，后来一向埋没了。某每到即以法晓谕，定要如此，亦使磨底磨得仔细，审底审得仔细，有新簿旧簿不同处，便批出理会。初间吏辈以为无甚紧要，在漳州押下县簿，付磨算司及审计司限到满日，却不见到，根究出乃是交点司未将上，即时决两吏，后来却每每及限。虽欲邀索，也不敢迁延，县道知得限严，也不被他邀索。如此等事，整顿得几件，自是省事，此是大纲纪。如某为守，凡遇支給官员俸给，预先示以期日，到此日，只要一日支尽，更不留未支，这亦防邀索之弊。看百弊之多，只得严限以促之，使他大段邀索不得。又曰：法初立时，有多少好意思，后来节次臣僚胡乱申请，皆变坏了。今非独下之人不畏法，把法做文具事，上自朝廷，也只把做文具行了，皆不期于必行。前夜说上下视法令皆为闲事，如不许州郡监司馈送，几番行下，而州郡监司亦复如前，但变换名目，多是做忌日，去寺中焚香，于是皆有折送，其数不薄。间有甚无廉耻者，本无忌日，乃设为忌日焚香以图馈送者。朝廷诏令事事都如此无纲纪，人人玩弛，可虑可虑！又曰：只如省部有时行下文字，尽有好处，只是后来付之胥吏之手，都没收杀。某在漳州，忽行下文字，应诸州用铸印处，或有阙损磨灭底，并许申上重行改造。此亦有当申者，如或有铸印处，乃是兵刑钱谷处，如尉有铸印，亦有管部弓兵司理。主郡刑狱乃无铸印，后来申去，又如掉在水中一般。过得几时，又行文字来，又申去，又休了。如今事事如此，省部文字一付之吏手，一味邀索，百端阻截。如某在绍兴，有诏助米人从县保明到州，州保明到监司，监司方与申部，忽然部中又行下一文字来，再令保明，某遂与逐一详细申去，已云从下一保明讫，未委今来因何再作行移？如此申去休了。后来忽又行下来，云助米人称进士，未委是何处，几时请到文解，还是乡贯如何，仰一一牒问上来。这是叵耐不叵耐？他事事敢如此邀求取索。当初朝廷只许进士助米，所谓进士，只是科举终场人，如何恁地说？某当时若便得这省吏在前，即时便与刺两行字配将去，然申省去将谓省官须治此吏，那里治他？

先生于州治射堂之后圃，画为井字九区：中区石磬为高坛，中之后区为茆庵，庵三窗，左窗牖为泰卦，右为否卦，后为复卦，前扇为剥卦，庵前接为小屋；前区为小茆亭；左右三区，各列植桃李，而间以梅。九区之外，围绕植竹。是日游其间，笑谓诸生曰：上有九畴八卦之象，下有九丘八阵之法。

吾辈不用有忿世嫉恶之意，第常自体此心宽明无系累，则日充日明，岂可涯涘耶？

今为避祸之说者，固出于相爱，然得某壁立万仞，岂不益为吾道之光？

或有人劝某宜略从时，某答之云：但恐如草性，锻炼得无性了，救不得病耳。

名著通览

章梈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光绪进士初及第。在光绪和宣统两朝先后任实录馆纂修、国史馆协修和翰林院检讨等职。年少时好读儒家书籍，对帝王统治之道尤感兴趣，他在“观历代兴衰之故，考列朝因革之原”的基础上，认为康熙之治冠于“百王之治”，于是萌生效仿唐朝吴兢之《贞观政要》而作《康熙政要》的念头。为了实现这一宏愿，章梈利用自己的任职条件，广泛搜集正史材料，慎重甄录相关文集，对稗官野史则抱着“不敢杂厕”的看法。与此同时，他又主动地同讲习馆同事“朝夕讨论”，自谓“再易寒暑”后，终于写成了《康熙政要》二十四卷合四十二篇。

康熙帝在历史上众多的封建帝王中，可算得上是一位雄才大略、卓然不群的皇帝。他那敏锐的洞察力，高尚的道德情操，坚强的意志，非凡的秉赋，渊博的学识，高雅的文化素养，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《康熙政要》这部书主要记载了他平时为政处事时的一些训诫和言谈，其中包括君道、任贤、宽仁、俭约、谦让等诸多方面。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大略了解一下他的政治观念和思想内涵。

全文及大意

论君道

康熙六年，圣祖躬亲大政治谕天下曰：“朕以冲龄，嗣登大宝。辅政臣索尼等，谨遵皇考世祖章皇帝遗诏，辅理政务，殚心效力，七年于此。今屡次奏请，朕承太皇太后之命，躬理万机。惟天地祖宗，付托之重。海内臣庶，望治方殷。朕以凉德夙夜只惧。天下至大，政务至繁，非朕躬所能独理。宣力分猷，仍惟辅政臣诸王贝勒内外文武大小各官是赖。务各殚忠尽职，洁己爱民，任怨任劳，不得辞避。天下利弊，必以上闻。朝廷德意，期於下究。庶政举民安，早臻平治。凡我军民，宜仰体朕心，务本兴行，乐业安生，以迓休宁之庆。政在养民，敢虚天地生成之德？当时亲政，恒念祖宗爱月之心。布告天下，咸使闻知”。

是年又谕吏部等衙门曰：“民为邦本，必使家给人足，安生乐业，方可称太平之治，近闻直隶各省，民多失所，疾苦颠连，深可悯念。或系官吏贪酷，朘削穷黎；抑或法制未便，致民失业。果何道以遂其生耶？一切民生利病，应行应革，尔内外各衙门大小文武等官，念切民依，其各抒所见毋隐。”宏文院侍读熊赐履奏：“臣备员侍从，遇皇上虚己求言，不敢摭拾浮词，以混宸听，谨因圣谕所及而推本言之。伏读诏书曰：‘今闻直隶各省人民，疾苦困穷，深可悯念，或因官吏朘削，或因法制未便。’此真二帝三王之用心也！但国家日言生聚，而凋敝愈甚。日言轸恤，而疮痍不起。日言招集、言蠲免，而流离琐尾之状，不可胜言。溯厥由来，诚如圣谕所云者，盖小民征终岁勤劳，仅给俯仰之资。而夏税秋粮朝催暮督，私派信于官征，杂项浮于正额，设一旦水旱频仍，饥谨见告。蠲赋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。赈济则官境其肥而民重其瘠。此不独守令之过也！上之则监司，又上之有督抚。有司之职业在地方，上官之激劝在举劾。伏乞皇上将见任督抚大加甄别，贤能者加衔久任，贪污不肖者，立赐罢斥，毋令久居民上。嗣后督抚缺出，不拘内外臣工，果有端方清正，望重才优者，敕部院大臣，从公保举，授以兹任。其考课也，以民生之苦乐，为守令之贤否，以守令之贪廉，为督抚之优劣，则廉者以劝，贪者以惩。有利必兴，有害必除，而民之不得所者寡矣。此圣谕所已及，而臣详切言之者也。虽然，内臣者，外臣之表也。京师者，四方之倡也。本原之地，亦在乎朝廷而已。臣请择其重且大者言之：一曰政事纷更，而法制未定。我国家章程法度，其闲者有积重难返者，不闻略加整顿，而急功喜事之人，又从而意为更变，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，以便其私，而不知无穷之弊，已潜倚暗伏于其中，朝举夕罢，以至盈廷聚讼，甲令游移，此时事之最急者也。伏乞圣之敕下议政王、贝勒、大臣、九卿、科道，将国家法度，详慎会议，凡沿革损益，参以古制，酌以时宜，勒成会典，颁示天下，则上有道揆，下有法守，垂于无疆之业在此矣。一曰职业日废，而士气日靡。国家之设官也，满汉相制，堂属相维，正欲其同寅协恭，俾责无他卸。近见各衙门大小臣工，大率默絨依阿，绝少实心任事之人，甚至托老成慎重之名，以济尸位素餐之计。树议者谓之疏狂，任事者目为躁竞，廉静者斥为矫情，端方者笑为迂腐。间有修身体道读书穷理之士，则群指为道学而非笑之，百计诋排，必禁锢其终身而后已。伏乞皇上位振颓风，作养士气，申饬满汉诸臣，虚衷酌理，实意任事，是则曰是，非则曰非。汉官勿以阿附满官为工，

堂官勿以偏任司官为计，宰执尽心论思，而不必以唯若为休容。台谏极力纠绳，而不必以钳结为将顺。则职业修养，官箴整肃矣。一曰学校废弛，而文教日衰。学校为贤才之藪，教化之基，而学术事功之根柢也。今庠序之教，缺焉不讲，师道不立，经训不明。士子惟揣摩举业以为取科名之具，绝不知读书讲学，以求圣贤理道之归。其高名者，又或泛滥百家，沈淪二氏惑世诬民，莫此为甚。伏乞皇上隆重师儒，兴起学校，畿辅则现成学院，各省则责成学道，使之统率于士子，讲明正学，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，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，敦崇实行，扶持正教，命府州县择士子中志趣端卓、英俊可造者，各举一二人，贡之国雍，宽其馆舍，厚其廩饩。又廷臣中择道德高劭之人，俾司成均，日进诸生而陶淑之，其道必本于伦，达乎天德。其教自洒扫应对，以致于义精仁熟，渐摩诱掖，循循有序，三载之后，学成材就，司成次其优劣，汇送吏部，量之材之大小之浅深而授之秩，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。至于山林隐逸之士，有经明修德，德业完备者，仍请敕下地方官，悉心咨访，据实奏闻，朝廷优礼延聘，加以褒崇，以为士习人心之劝，则道术以正，学术以明，教化大行，人材日盛，其有补于国家也，宁浅鲜哉？一曰风俗僭侈，而礼制日废。礼者圣王所以节性防淫，而维系人心者也。臣观今日风俗，奢侈陵越，不可殫述，一裘而费中人之产，一宴而糜终岁之需，與隶披贵介之衣，倡优拟命妇之饰，此饥之本寒之源，而盗贼狱讼所由起也。然礼教之行，处贵近始，伏乞皇上躬行节俭，为天下先，以王公及士庶，凡官室车马衣服仆从一切器用之属，俱之定经制，限以成数，颁亦天下，俾恪为遵守，不许少有逾越。久之俭德日彰，贪风日息，民俗醇而人心厚，几于敦庞之治不难矣。虽然，皇躬者又万几所受裁，而万化所从出也。我皇上神明大纵，睿哲性成，今春秋方富，薰陶德生，端在此时，伏乞慎先耆儒硕德。置之左右，优以保衡之任，使之从容闲谏，讲论道理，启沃宸衷，涵养圣德。又妙选天下英俊，陪侍法从，以备顾问，毋徒事讲幄虚文。若夫《大学衍义》一书，叙千圣之心传，备百王之治统，伏愿皇上朝夕讲贯，证诸公经之文，通诸历代之史，以为敷政出治之本。至于左右近习，必端厥选，内而深宫谏闲，外而大廷广众，微而起居言动，凡所以维持此身者，无所不备。防闲此心者，无所不周，则君志清明，君身强固，坐收礼乾行健之成功。是皇上直接二帝三五相传之心法，自有以措斯世斯民于唐虞三代之盛，又何吏治不清民生不遂足虑哉？此又圣谕所未及；而臣推本言之者也。”疏入，报闻。

康熙十一年。圣祖召讲官等至懋勤殿谕曰：“汉官中有请令言官以风闻言事者，朕思忠爱之言，切中事理，患其不多。若不肖之徒，借端生事，假公济私，人主不察，必至侵害善良，扰乱国政为害甚巨。”又来曰：“从来与民休息，道在不扰，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。朕观前代君臣，每好大喜功，劳民伤财，紊乱旧章，虚耗元气，上下讟器，民生日蹙，深可为鉴。”熊赐履奏曰：“皇上此谕，诚千古为治之要道也。”

康熙十二年。圣祖御弘德殿，讲官讲讲华，谕进讲官等曰：“从来民生不遂，由于吏治不清，长吏贤则百姓自安矣。天下善事俱是分所当为，近见有寸长片善，便自矜夸，是好名也。”又谕曰：“有治人无治法，但真能任事者，亦难得。朕观人必先心术，次才学，必术不善，纵有才学何用？”然熊赐履奏曰：“圣谕及此，诚知人之要道也。”寻又谕讲官等曰：“从来君臣一心图治，天下不患不治，此等光景，未易多得。朕与诸臣，何可不交勉之？”熊赐履奏曰：“为政端在得人，故用舍黜陟，人主出治人大权，最当审量者

也。”圣祖曰：“知人难，用人不易，至治之道，全关于人。朕即欲不尽心不可得也。”又谕讲官等曰：“致治之道，不宜太骤，但须日积月累，久之自在成效。朕平日读方穷理，总是要讲求治道，是诸实行，不徒言耳！”又谕曰：“人主势位崇高，何求不得？但须有一段敬畏之意，自然不至差错。即有差错，自能省政。若任意率行，略不加谨，鲜有不失之纵佚者，朕每念及此，未尝一刻敢暇逸也。”熊赐履奏曰：“圣谕及此，即尧舜兢业之心也。”

康熙十六年，讲官喇沙里、陈廷敬等进讲《孟子·一暴十寒》章。圣祖曰：“君子进则小人退，小人进则君子退。君子小人，势不并立。孟子所谓一暴十寒，于进君子退小人，亲贤远佞之道，最为明快，人君诚不可不知也。”又谕讲官曰：“尔等进讲经书，皆内圣外五修齐治平之道，朕孜孜详询，每讲之时必专意以听，但学问无穷，不在徒言，要惟当躬行实践，方有益于所学。尔等仍直言无隐，以助朕好学进修之意。”

康熙十八年。圣祖谕浙江巡抚李本晟曰：“近来兵多不能调和，尔应尽心料理，每见各省督抚料理事务，所见只在一省，不能通行，凡事应悉心区划，从天下大计起。李本晟奏曰：“目前惟兵最急，民富则国裕，民穷则饷兵无从而办。”圣祖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古今不易之理也。”

康熙二十三年，圣祖谕大学士等曰：“朕凡裁决政务，必求致当，故于部院奏章，虽小事亦未尝不尽心详酌。近见户刑二部奏事，至为繁冗，是皆钱粮刑名所关，若丛集一时，不加详阅，恐有遗误。前此奏章，俱三日一送，自今两日一送，又便从容详览。”

是年，圣祖幸金山，乘沙船渡扬子江，风浪恬静，舟行甚速。谕侍臣曰：“自兵兴以来。恢复岳州，长沙、多得舟楫之力。今海宇承平，昔时战舰，仅供巡幸渡江之用。然安当思危，治不忘乱，朕乘此舟，未尝不念艰难用武之时，非以游观为乐也。”

是年，圣祖谕讲官等曰：“朕于政事，无论大小，从未有草率完结者。每在宫中默坐，即以天下事经营筹划于胸中。简任督抚之时，又必详加察访，盖一方大吏贤能，自能表率僚属。今贪墨之风，未必尽除，然激劝澄清，正欲使之潜移默化也。”

康熙二十八年。大学士、九卿等奏：“近闻山东、河南大雨霑足，直隶大名诸府皆有雨，京城昨晚亦已得雨。皇上于宫中日日虔祷，朝夕儆惕，茹素修省，忧劳过甚，请稍舒睿怀，以颐养圣躬。”圣祖曰：“朕可与他人比耶？先人而忧，后人而乐，理固宜然。近因久旱无雨，忧劳过甚，以致羸弱。人或可欺，天亦可欺耶？日前祈雨，朕虽未躬往，而每次祈祷，朕皆竭诚斋戒。荷天之眷，得降雨泽，此后雨泽霑足，朕庶解焦劳也。”

康熙二十九年。圣祖谕大学士、九卿，詹士、科道曰：“尔等诸臣称雨泽霑足，固当欢悦，但去年大旱，民困未苏。昔汉文帝为三代以下令主，贾谊犹以处厝火积薪之上而谓无危为喻，以今较之，可无虑乎？且今虽得雨，不知夏秋若何，其当远虑深思，愈加轸恤，何得称庆？”

康熙二十九年。圣祖谕大学士、部院大臣等曰：“今朕躬已愈，但因灼艾，未御乾清门耳。朕听政三十年来，无日不见诸大臣，共相谘议。今处宫中，虽日理奏章，未尝废事，而与诸大臣悬隔，思之如有所失，且旗下引见题补诸事，恐致壅滞，向有大臣奏事乾清宫之例，自明日始，仍如常进乾清宫启奏。”

康熙三十年。工部等衙门议复古北口总兵官蔡元疏言，古北口一带边墙倾塌甚多，请行修筑，应如所请。圣祖谕大学士等曰：“蔡之所奏，未谙事宜。帝王治天下，自有本原，不专恃险阻。奏筑长城以来，汉唐宋亦常修理，其时岂无边患？明末我太祖统大兵，长驱直入，诸路瓦解，皆莫敢当。可见守国之道，惟在修德安民。民心悦服，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，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。如古北喜峰口一带，朕皆巡阅，概多损坏，今欲修之，兴工劳役，岂能无害百姓？且长城延袤数千里，养兵几何，方能分守？蔡元见未及此，其言甚属无益，谕九卿知之。”

先是，康熙四十六年，圣祖谕大学士温达等曰：“顷因刑部汇奏事内有一字错误，朕以硃笔改正发出。内外各衙门奏章，朕皆一一全览。外人谓朕未必通览，故朕一应本章，见有错字，必行改正。其繙译不堪者，亦改削之。当用兵时，一日有三四百本章，朕悉亲览无遗；今一日中仅四五十本章而已，览之何难？一切事务，不可少有怠慢之心也。至五十谕大学士等曰：“朕理机务年久，阅本甚速，凡一应奏折及绿头牌，顷刻即能详阅。前尚书穆和伦数次奏事，意朕未加详阅，复行奏请，朕将事内缘由指明，穆和本乃默然无言而退。且朕阅事，不止于速，凡一经目，断不遗忘。一应奏章及汇题案件，无不详阅，有差误字句，朕必硃笔更改发出。”

康熙五十六年。圣祖谕大学士等曰：“自古人主多厌闻盗贼水旱之事，殊不知凡事由微至钜，豫知而备之，则易于措办。所以朕于各省大小事务，惟欲速闻知也。即如各省来京之人，从福来者，朕以浙江米价询之；自江南来者，朕以山东米价询之。伊系经过之地，必据陈奏，即彼省大吏，知不可隐，亦皆能实奏。米价既已悉知，则年岁丰歉，亦可知矣。”

是年，又谕大学士等曰：“为君之道，要在安静，不必矜奇之异。亦不可徒为夸大之言。程之曰：“人不学不为圣人，皆自弃也。此语亦属太过，尧舜之后岂复有尧舜乎？昔人有言，孟子不足学，须学颜子。此皆务大言不务实践者。朕自幼喜读性理书，千言万语，不外一敬字。人君治天下，但能居敬，终身行之足矣。尝论敬行简曰，观民气之静躁，而政之得失可知也；观政事之繁简，而治之隆替可知也。上古之世，淳淳闷闷，执契而自平，结绳自治，猗欤盛矣。自禅继相承，创守代见，张弛因革，道非一端，约而举之。其正简者治隆，其政繁者其治替，此古今不易之理，虽百世而可知也。虽然，此特就其所行者言之耳。若夫宰治之原，则有至要者存焉，使操之无本。而以一简为主，则任法之弊，必尚于综核。省事之渐，必流于丛脞。秦之衡石程书，晋之清言招祸，其所失均也，必也主之以至一，本之以无私，正心以穷理，而是非不得淆其中。虚己以知人，而邪正不得淆其外。夫然后见之措施，清静画一，无为而治，事有不期简而自简者，故曰君子之学大居敬。”

是年，圣祖御乾清宫东暖阁，召诸王子及满汉大学士、学士、九卿、詹事、科道等人，谕曰：“朕少时天禀甚壮，从未知有疾病。今春始患头晕，渐觉消瘦。至秋月塞外行围，蒙古地方水土甚佳，精神日健，颜貌加丰，每日骑射，亦不觉疲倦。回京之后，因皇太后违和，心神忧瘁，头晕频发，有朕平日所欲言者，今特召尔等面谕，从来帝王之治天下，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。敬天法祖之实，在柔远能迩，休养苍生，公四海之利为利，一天下之心为心，体群臣，子庶民，保邦于未危，致治于未乱，夙夜孜孜，寤寐不遑，宽严相济，经权互用，以图国家久远之计而已。自古得天下之正，莫如

我朝太祖太宗，初无取天下之心。当兵及京城，诸大臣咸奏云当取，太宗皇帝曰：‘明与我国素非和好，今取之甚易，但念中国之主，不忍取也。’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，崇祯自缢，臣民相率来迎，乃翦灭闯寇，入承大统。昔项羽起兵攻秦，后天下卒归汉，其初汉高祖一泗亭上长耳！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，天下卒归于明，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！我朝承绪先烈，应天顺人，抚有区宇，以此见乱臣贼子，无非为真主驱除也。朕年将七旬，在位五十余年者，实赖天地宗社之默佑，非予凉德之所致也。朕自幼读书，古今道理，粗能通晓，凡帝王自有天命，应享寿考者，不能使之不享寿考；应享太平者，不能使之不享太平。自黄帝甲子至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，称帝者三百有余。但秦史以前，三代之事，不可全信。始皇元年至今一千九百六十余年，称帝而有年号者，二百一十有一。朕何人斯，自秦汉以下，在位久者，朕为至首。古人以不矜不伐，知足知止者，为能保始终。览三代而后，帝王践祚久者，不能贻令闻于后世。寿命不长者，罔知四海之疾苦。朕已老矣，在位久矣，未卜后人之议论如何，而且以目前之事，不得不痛哭流涕，豫先随笔自记，而犹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。自古帝王多以死为忌讳，每观其遗诏，殊非帝王语气，并非中心之所欲言，此皆昏瞽之际，觅文臣任意撰拟者。朕则不然，今豫使尔等知朕之血诚耳，当日临御至二十年，不敢逆料至三十年，三十年不敢逆料至四十年。今已五十七年矣，《尚书·洪范》所载：‘一曰寿；二曰富；三曰康宁；四曰攸好德；五曰考终命。’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，诚以其难得数也。今朕将七十，子孙曾孙百五十余人，天下粗安，四海承平，虽不能移风易俗，家给人足，但孜孜汲汲，小心敬慎，夙夜不遑，未尝少懈，数十年殚心竭力，有如一日，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赅括耶？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，史论概以为侈，然自耽于酒色所致，此皆书生好为讥评，虽纯全尽美之君，亦必抉摘瑕疵，朕为前代帝王剖白，盖由天下事繁，不胜劳惫之所致也。诸葛亮云：‘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’为人臣者仅诸葛亮一人耳！若帝王仔肩甚重，无可旁诿，岂臣下所可比拟！臣下可仕则仕，可止则止，年老致此而归，抱子弄孙，犹得优游自适。为君者勤劬一生，了无休息，如舜虽称无为而治，然身殁于苍梧，禹乘四载，联于胼足，终于会稽，似此皆勤劳政事。巡行周历，不遑宁处，岂可谓之崇尚无为清静自持平？《易》遯卦六爻，未尝言及人主之事，可见人主原无宴息之地，可以退藏，鞠躬尽瘁，诚谓此也。诸人每云，帝王当举大纲，不必兼综细务，朕心窃谓不然，一事不谨，即贻四海之忧；一时不谨，即贻千百世之患。不矜细行，终累大德，故朕每事必加详慎。即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，明日即多一二事矣。若明日再务安闲，则后日愈多壅积。万机至重，诚难稽延。故朕莅政，无论钜细，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，必为改定发出。盖事不敢忽，天性然也。五十余年，每多先事绸缪，四海兆人，亦皆戴朕德意，岂可执不兼综细务之言乎？朕自幼强健，筋力颇佳，能挽十五力弓，发十三握箭，用兵临戎之事，皆所伏为。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，平定三藩，扫清漠北，皆出一心运筹，户部帑金，非用师赈饥，未敢妄费，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。所有巡狩行宫，不施采绩，每处年费不过一二万金，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，尚不及百分之一。幼龄读书，即知酒色之宜戒，小人之宜防，所以至老无恙。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后，过伤心神，渐不及往时，况日有万机，皆由裁夺，每觉精神日逐于外，心血时耗于内，恐前途傥有一时不讳，不能一言，则吾之衷曲未吐，岂不可惜！故豫于明爽之际，一一言之，可以尽一生之事，岂不快哉！人之有生必有死，

如朱子之言天地循环之理，如昼如夜。孔子云：‘居易以俟命’，皆圣贤之大道，何足惧乎？近日多病，心神恍惚，身体虚惫，动转非人扶掖，步履难行。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，许死而后已之志，今朕抱病，怔忡健忘，故深惧颠倒是非，万机错乱，心为天下尽其血，神为四海散其形，既神不守舍，心失怡养，目不辩远近，耳不分是非，食少事多，岂能久存？况承平日久，人心懈怠。福尽祸死，泰去否来，元首丛脞，而股肱堕，至于万事隋坏，而后天灾人害，杂然并至，虽心有余而精神不逮，悔过无及，振作不起，呻吟床榻，死不冥目，岂不痛恨未死！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，后至髦年，为侯景所逼，遂有台城之祸。隋文帝亦开创之主，不能豫知其子炀帝之恶，卒致不克令终。又如丹毒自杀，服食吞饼，宋祖之遥见烛影之类，种种所载疑案，岂非前辙？皆由辩之不早，而且无益于国计民生。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，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。朕每览此，深为耻之。或有小人希图仓卒之际，废立可以自专，推戴一人以期后福，朕一息尚存，岂肯容此辈乎？朕之生也并无灵异：及其长也，亦无非常。八龄践祚，迄今五十七年，从不许人言祲符瑞应，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，及焚珠玉及殿前、天书降承天，此皆虚文，朕所不取。惟日用平常，以实心行实政而已。今臣邻奏请之储分理，此乃虑朕用猝然之变耳，死生常理，朕所不讳，惟是天下大权，当统于一。十年以来，朕将所行之事，所存之心，俱书写封固，仍未告竣。立储大事，朕岂忘耶？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释此负荷，优游安适，无一事撓心，便可望加增年岁。诸臣受朕深恩，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。朕今血气耗减，勉强支持，脱有误万机，则从前五十七年之忧勤，岂不可惜？朕之苦衷血诚，一至于此。每览老臣奏疏乞休，未尝不为流涕。尔等有退休之时，朕何地可休息耶？但得数旬之颐养，但全考终之至生，朕之欣喜，岂可言罄？此岁月悠久，或得如宋高宗之年未可知也。朕年五十七岁，方有白须数茎，有以乌发药进者，朕笑却之曰：古来白须皇帝有几？朕若须鬓皓然，岂不万世之美谈乎！初年同朕共事者，今并无一人。后进新升者，同寅协恭，奉公守法，皓首满朝，可谓久矣，亦知足矣。朕享天下之尊，四海之富，物无不有，事无不经。至于垂老之际，不能宽怀瞬息，故视弃天下犹敝履，视富贵如泥沙也。傥得终于无事，朕愿已足。愿尔等大小臣邻。念朕五十余年太平天子，惓惓丁宁反复之苦衷，则吾之有生考终之事毕矣。此谕已备十年，若有遣诒，无非此言，披肝露胆，罄尽五内，朕言不再。

康熙六十年。圣祖谕近御侍卫等曰：“尔等日侍朕侧，于朕心忧劳之处，差知大概，若百官万民，何从而知？朕日理万机，其他姑置勿论，即每年春时，为雨水田禾，时刻不忘，留心究问，直至秋成，始稍释念。至于冬日，内地常恐雪少，口外地方，又恐雪大，此等苦心，惟身历方能知之。即尔等日侍左右者，也未必悉知也。”

圣祖躬尧舜之资，行汤文之政，所以立万年长治之基者，曰行王道。御制王道论曰：治天下必审择所以为治之道，然后运之有本，而措之也不劳。盖得其道，则一时无赫赫之功，而久大之业，可以永建而不可拔。不得其道，则殚尽敝形，而终无以及于治。故治理之方，不可不审也，其要在仁义而已矣。昔三代之盛也，蠲烦去苛，屏饰斥伪，先躬行而后文告，崇礼让而缓刑罚，优游渐渍，不期效于旦夕，迨积之既久，风俗日茂，人心日淳，大化敦庞，号为上理，此行仁义之所至也。秦汉而下，务为一切苟且之政，以检束其民，民生其时，亦皆匿情饰貌以应上其上，上下相蒙，竞趋媮薄，治功之

降，远不古若，此则不行仁义之故也。故曰：仁以育之；义以正之。仁以育之，所以养也；义以正之，所以教也。孔子曰‘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’。又曰：‘圣人久于其道，而天下化成。’盖言王道之成，仁义之效也。是以圣王在上，制田里，广树畜，省刑而薄敛，崇本而抑末，使天下之民，家给人足，有俯仰之乐，而无阽危之患。由是立庠序之制，置慈惠之师，修六礼以节其性，播六乐以淑其情，明七教以兴其德，齐八政以禁其非。当是之时，六合之远，一家之积也；四海之广，一身之推也；天下之久安而长治，犹泰山而四维之也。其去夫唐虞之治，不亦远乎？呜乎！天也重器也，有天下大业也。彼挈瓶之智，犹必厝之于至安，况夫居重器而履大业者哉！盖亦知所择也。

圣祖孜孜求治，日昃不遑，机务之余，犹有日课，其宫中日课记曰：尝读商《颂》之成汤也，曰圣敬日跻。周《诗》之文武也，曰：缉熙，曰执兢；其成王也，曰夙夜基命宥密。而史亦称大禹惜寸阴，色而起，则命讲官捧书而入，讨论义理，是典学者为一时。出御宫门，则群工循序奏事。朕亲加咨度，是听政者为一时。已而阁臣升阶，朕与详求治理，咨谏军国者久之。若夫宫禁之务，各有攸司。廷臣退，乃裁决焉。既事竟，罢朝。宫中图籍盈几案，朕性好读书，丹黄评阅，辄径寸，辩报别古今治乱得失。暇或赋诗，或作古文，或临池濡翰，以写其自得之趣。止此数事，已不觉其日之夕矣。及宫中燃烛，玉漏初下，则省一日所进章疏，必审其理道之安而后已。要非夜分，不就宴息也。旭是者岁率以为常。夫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之德，自揣乌能企及，而不敢懈怠之心。或者其庶几焉，因为记自勖以比于盘铭之义云。

圣祖综理万机，在位数十年，恒如一日，尝作《无逸》，以致寿论曰：三代盛时，民风洵穆，政令淳简，天下诸侯，分治其国。为之君者，可以优游坐治矣。乃圣君处此，必兢兢业业，宵旰不遑。以自劳其神力，然卒获享遐福，而成令名，秦汉而降，废封建而为郡县，凡事之有关于宫府者，无不奏请于天子，其机务之众，千百倍于三代。宜为之君者，日给且不暇。乃或自图便安，至信神仙为可学、辄为方士所误，曾不之返者，何哉？朕尝观于商、周、汉、唐诸往事，而得其故矣，人君之所无逸者，莫如商之中宗与高宗。及周之文王，中宗则严恭寅畏，天命自度；高宗则作其即位，不敢荒宁；文王则怀保小民，惠鲜齔寡。而考其享国之年，此三君者，最为悠久。迄今《无逸》一篇，班班可观也。人君之好逸乐者，莫如秦之始皇，汉之武帝，唐之宪宗。始皇既并天下，方士争言不死之药，于是遣使访三山，神仙之药卒不可得。武帝敬鬼神之事，祠太乙，建飞廉馆，作柏梁台，以招天神之属。游心芒思者数年，究天左验，乃自叹愚惑。宪宗招求方士，用柳泌为刺史，求仙药，以服之日益燥渴。夫中宗、高宗、文王之敬修其德而享福者若此，始皇、武帝、宪宗云博养其生而寡效者若彼，然则帝王致寿道，从可识矣。宋儒吕祖谦曰：敬之方，寿之理也。盖无逸则主敬，主敬则无欲，无欲者仁也。孔子曰：仁者寿，又仁则有德。孔子曰：大德必得其寿，舜年百有十岁是也。则寿之理，亦视其德之盛衰为何如耳！朕愿后世之为君者，无惑于神仙之说，而第求之无逸之旨，则身与天下皆蒙其福矣。

圣祖阅史至司马光上宋仁宗札子曰：司马光立朝行己，正大和平，无几微之可议，不只冠有宋诸臣，求之历代，亦不可多得。其论君德有三，曰仁、明、武。治道有三：曰任官；信赏必罚；要言至理。可书丹宸座右，万世不

易也。

圣祖阅史至宋高宗作损《齐论》曰：宋高宗以损《齐论》，自是清心寡欲之意。第当其时，正宜奋励有为，非仅淡泊为谦，可以恢复大业，即此一端观之，知其优游苟且，而无振作之志矣。

圣祖讲筵绪论曰：尝观明仁宗宣宗时，用法皆术宽平。每思人君承天子民，时育万物，自当以宽厚为本，始可成敦裕之治，但不可过于纵弛，所贵乎宽而制耳。

论曰：人君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，以天下之心思为心思，何患见之不广？观舜以好问好察而称大智，则知自用则小者，正与之相反矣。

论曰：临民以主敬为本。昔人有言，一念不敬，或貽四海之忧；一日不敬，或致千百年之患。《礼记》首言毋不敬。《五子之歌》，始终皆言谨慎。大抵诚与敬，千圣相传之学，不越乎此。

论曰：古人有言，反经合道谓之权：先儒已有论其非者，天下止有一经常不易之理，权衡轻重，随时斟酌，而不失乎经常之理，此即所谓权也，岂有反经而可以行权者乎？

论曰：古人纪一事，当观其要旨所在。如郭隗市骏之语，见求士不可以不诚。甘茂投杼之言，见任人不可以不信。此要领处，尤不可不知也。

论曰：今人沿于明季陋习，积渐日深，清操洁已。难言之矣。职守亦多至旷怠，罕能恪勤。朝廷良法美意，往往施行未久，即为丛弊之也。常欲化道转移，每患积习之难去也。

圣祖庭训曰：人惟一心起为念虑，念虑之正与不正，只在顷刻之间，若一念之不正，顷刻而知之。即从而正之，自不至离道之远。《书》曰：惟圣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圣。一念之微，静以存之，动则察之，必使俯仰无愧，方是实在工夫。是故古人治心，防于念之初生。情之未起，所以用力甚微，而收功甚巨也。

训曰：世人皆好逸而恶劳，朕心则谓人恒劳而知逸，若安于逸，则不惟不知逸，而遇劳即不能甚矣。故《易》有云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由是观之，圣人以劳为福，以逸为祸也。

训曰：凡人有训人治人之职者，必身先之可也。《大学》有云：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诸己而后非诸人。特为身先而言也。

训曰，孔子云，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诚为政之至要。朕居位六十余年，何政未行？看来凡有益于人之事，我知之确，即当行之。在彼小人，惟知目前侥幸，而不念日后久远之计也。凡圣人一言一语，皆至道存言。

训曰：天下事固有一定之理。然有一等事，如此似乎可行，又有不可行之处。有一等事，如此似乎不可行，又有可行之处。若此等事，在以义理揆之，决不可豫定一必如此必不如此之心。是故孔子云：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此。

训曰：天下事物之来不同，而人之识见亦异。有事理当前，是非如睹，出平日学所至，不待拟议而后得之，此素定一识也。有事变攸来，一时未能骤为，必待深思而后得之，此徐出之识也。有虽深思不能得，合众人之心思，其间必有一当者，择其是而用之，此取资之识也。此三者，虽圣人亦然。故周公有关雎之思。而尧舜亦曰：畴咨稽众，惟能竭其心思，能取于众，所以为圣人耳。

训曰：凡理大小事务，皆当一体留心。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，以事虽小

而不防之，则必渐大，渐而不杜，必至于不可杜也。

训曰：孟子云：或劳心，或劳力；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朕即位多年，虽一时一刻，此心不放，为人君者，但能为天下民生忧心，则天自佑之。

训曰：国家赏罚治理之柄，自上操之，是故转移人心，维持风仕。善者知劝，恶者知惩。所以代天宣教，时亮天工也。故爵曰天职，刑曰天罚。明乎赏罚之事，皆奉天而行，非操柄者所得私也。《韩非子》曰：赏有功罚有罪，而不失其当，乃能生功止过也。《书》曰：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！天讨有罪，五刑五用哉！政事懋哉懋哉！盖言爵赏刑罚，乃人君之政事，当公慎而不可忽者也。

训曰：曩者三逆未叛之先，朕与议政诸王大臣议迁藩之事，内中有言当迁者，有言不可迁者。然在当日之势，迁之亦叛，即不迁亦叛，遂定迁藩之议。三逆既叛，大学士索额图奏曰，前议三藩当迁者，皆宜正国法。朕曰，不可。廷议之时，言三藩当迁者，朕实主之。今事至此，岂可归过于他人？时在廷诸臣，一闻朕旨，莫不感激涕零，心悦诚服。朕从来诸事不肯委罪于人，矧军国大事，而肯卸过于诸大臣乎？

【大意】

康熙六年他上朝执政，即告天下，有如现在的就职演讲，表明自己的态度。他说：“天下至大，政务至繁，非朕躬所能独理。宣力分猷，仍惟辅政臣诸王贝勒内外文武大小各官是赖。务各殚忠尽职，洁己爱民，任怨任劳，不得辞避。天下利弊，必以上闻，朝廷德意，期于下究。庶政举民安，早臻平治”。

同一年，康熙又对吏部等衙门下谕：民为邦本，必使家给人足，安生乐业，方可称太平之治。近闻直隶各省，民多失所，疾苦颠连，深可悯念。这是因酷吏盘剥呢，还是制度致使百姓失业呢？用什么办法使百姓生活好起来呢？你们各抒己见，不要隐瞒。

宏文院侍读熊赐履回奏了康熙。大意如下：

盖小民征终岁勤劳，仅给俯仰之资。而复税秋粮朝催暮督，私派信于官征，杂项浮于正额，设一旦水旱频仍，饥谨见告。

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。说是贪官之作祟，而且由下而上，都有罪责，故应选清廉之官委以重任。接着他又提出四点建议：第一是政事纷更，而法制未定。因此要将国家法度，详慎会议，凡沿革损益，参以古制，酌以时宜，勒成会典，颁示天下，则上有遵奉，下有法守，无疆之业永垂在此一举；第二是职业日废，而士气日靡。针对这种现状，应重振朝风，作养士气，申饬满汉诸臣，虚衰酌理，实意任事，是则曰是，非则曰非。则职业修养，官箴整肃矣；第三是学校废弛，而文教日衰。他首先阐明兴学的重要性，说：学校为贤才之藪，教化之基，而学术事功之根基也。所以应该隆重师儒，兴起学校，那么就会道术以正，学术以明，教化大行，人材日盛，这对国家帮助难道很小吗？第四是风俗渐侈，而礼制日废。他首先分析了侈靡的现状，即一裘而费中人之产，一宴而糜终岁之需……此饥之本寒之源，而盗贼狱讼所由起也。因此请求皇上躬行节俭，为天下先，以王公及士庶，凡官室车马衣服仆从一切器用之属，俱定经制，限以成数，颁示天下，务必遵守，不许稍有逾越。那么久之则俭德日彰，贪风日息，民俗醇而人心厚，天下太平就会成为现实。

康熙十一年，他对讲官们说：从来与民休息，道在不挠，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。朕观前代君臣，每好大喜功，劳民伤财，紊乱旧章，虚耗元气，上下讻器，民生日蹙，深可为鉴。

康熙十二年，康熙在弘德殿的语录：

朕观人必先心术，次才学，心术不善，纵有才学何用？

知人难，用人不易，至治之道，全关于上，朕即欲不尽心不可得也。

康熙十六年，在听讲《孟子·一暴十寒》时说：君子进则小人退，小人进则君子侧。君子小人，势不并立。孟子所谓一暴十寒，于进君子退小人，亲贤远佞之道，最为明快，人君诚不可不知也。

康熙二十三年，圣祖谕讲官等曰：朕于政事，无论大小，从未有草率完结者，每在宫中默省，即以天下事经营筹划于胸中。

康熙二十八年，因旱，圣祖数日祈雨。雨至，诸臣请求圣祖休息。圣祖说：朕可与他人比耶？先人而忧，后人而乐，理固宜然。

康熙三十年，工部议准修复长城之奏，康熙反对，说：帝王治天下，自有本源，不专恃险阻。修筑长城以来，汉唐宋也经常修理，那时就没边患吗？明末我太祖统大兵，长驱直入，诸路瓦解，皆莫敢当。可见，守国之道，惟在修德安民，民心悦服，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，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。如古北喜峰口一带，朕皆巡阅，概多损坏，今欲修之，兴工劳役，岂能无害百姓？且长城延袤数千里，养兵几何，方能分守？

康熙批阅奏章，每日少时数十本，多时数百本。他说：朕阅事，不止于速，凡一经目，断不遗忘。一应奏章及汇题案件，无不详阅，有差误字句，朕必朱笔更改发出。

康熙爱护百姓可谓细致入微，他每见来京官员，必问当地米价，因为知道了米价，就可推算出各地的收成如何。

是年，圣祖又谕大学士等曰：为君之道，要在安静，不必矜奇之异，亦不可徒为夸大之言。

这一年，康熙已近七十高龄，因患病初愈，自然想到身后之事，故召集诸王子并百官，将自己执政五十七年的历史作了一番总括。他说：从来帝王之治天下，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。敬无法祖之实，在于休养苍生，公四海之利为利，一天下之心为心，体群臣，子庶民，保邦于未危，致治于来乱。夙夜孜孜，寤寐不遑，宽严相济，经权互用，以图国家久远之计而已。

有人说，帝王当举大纲，不必兼综细务，朕谓不然。一事不谨，即贻四海之忧；一时不谨，即贻千百之患。不矜细行，终累大德，故朕每事必加详慎。

朕年五十七岁，方有白须数茎，有以乌发药进者，朕笑却之曰：古来白须皇帝有几？朕若须鬓皓然，岂不万世之美谈乎！

圣祖躬尧舜之资，行汤文之政，所以历万年长治之基者，曰行王道。御制王道论曰：治天下必审择所以为治之道，然后运之有本，而措之也不劳。盖得其道，则一时无赫赫之功，而久大之业，可以永建而不可拔。不得其道，则殚精敝形，而终无大治。故治理之方，不可不审也，其要在仁义而已矣。

康熙曾作《无逸》一文，专论寿命。文章历数秦始皇、汉武帝、唐宪宗，都是好逸乐者。他们或求不死之药，或出海寻仙，或敬鬼神，但最终仍是白费力气。他认为，无逸则主敬，主敬则无欲，无欲者仁也。孔子曰：仁者寿，又仁则有德。朕愿后世之为君者，无惑于神仙之说，而求无逸之旨，则身与

天下皆蒙其福矣。

圣祖评司马光时说：司马光立朝行己，正大和平，求之历代，不可多得。其论君德有三，曰仁、明、武；治道有三，曰任官、信赏必罚、要言至理。

人君以天下耳目为耳目，以天下之心思为心思，何患见之不广？

临民以主敬为本。昔人有言，一念不敬，或貽四海之忧；一日不敬，或以致千百年之患。

圣祖庭训曰：人惟一心起为念虑，念虑之正与不正，只有顷刻之间，若一念之不正，顷刻而知之。即从而正之，自不至离道之远。

训曰：凡人有训人治人之职者，必身先之可也。

训曰：天下事物之来不同，而人之识见亦异。有事理当前，是非如睹，出平日所学至，不待拟议而后得之，此素定之识也。有事变攸来，一时未能骤为，必待深思而后得之，此徐出之识也。有虽深思不能得，合众人之心思，其间必有一当者，择其是而用之，此取资之识也。此三者，虽圣人亦然。能取众人，所以为圣人耳。

明乎赏罚之事，皆奉天而行，非操柄者所得私也。《韩非子》曰：赏有功，罚有罪，而不失其当，乃能生功止过也。

论俭约

我朝起自东陲，尊尚朴质，历传以来，继序不忘。用能宫府服御，无侈饰、无冗费，昭俭德以示子孙。顺治八年，以督催织造官役，骚扰驿迁，罢之。停陕西织造裁羯毼蟒。却江西造进龙盃，十一年以江浙连年水旱，停织造二年。

圣祖常论本朝自入关以来，外廷军国之费，与明代略相仿佛，至宫中服用，则以各宫计之，尚不及当时妃嫔一宫之数。三十六年之间，尚不及当时一年所用之数。康熙二十九年，上以前明宫殿楼亭门名，并慈宁宫、宁寿宫、乾清宫及老嫗目，宣示外廷，谕天旱欲减宫人。及所用器物，因自来未尝有余，故不能再减。飭群臣将故明宫中用度察阅。寻廷臣奏查故明宫内，每年用金花银九十六万余两，今悉充饷，光禄寺送内用二十四万两，今止三万两，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多万斤，今止七八百万斤。红螺灰一千二百多万斤，今百余万斤。各宫床帐舆轿花毯之属二万余两，俱不用。故明宫殿楼亭门名七百八十六座，今不及十分之三。至各宫殿其址墙垣，砖用临清，木用楠木。今禁中修造出于断不得已，第用常瓦松木而已，我皇上樽节俭约，至矣极矣。是光禄寺年用银十万两，工部二三十万两，较前朝省十之九，而上犹以工部每月辄用数万两。谕以内廷除赏赐外，一应工作费用，月不及千两。

四十九年，又谕曰：万历以后，内临有在御前服役者，故明季事迹，知之独详。明朝费用甚奢，工作亦广，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，供应数百万两，世祖登极，始悉除之。紫禁城内铺地瓦，横竖七层，工作俱派民间。今器用朴素，工作皆见钱雇觅。明季宫人九千人，内监十万人，饿食不能遍及，日有饿死者，今宫中不过四五百人而已。先是，光禄寺岁用六七十万，工部百余万，世祖末年，光禄寺年用四五万，工部十五万余，是以部库有五千余万之积。

圣祖尝曰：当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。以此为训，不敢过也，自是恭俭相承，累代传为家法矣。

康熙八年，圣祖谕工部曰：前奉太皇太后谕，谓乾清宫交泰殿栋梁朽坏，宜撤旧重建，以为朕宫，慈命谆复，朕不敢违。但陶唐茅茨不剪，夏禹宫殿是卑。其毋事华丽，止令朴质坚固，以称太皇太后倦倦至意。

康熙十六年，给事中徐旭龄奏请力行节俭疏曰：近以亢旱修省，仰见我皇上敬天勤民至矣。日前雨泽虽降，而旱魃既久，难免灾荒，臣思古之圣君贤相，一食而知天下之饥，一衣而思天下之寒。故能上下一德，而天休协应。皇上轸念民艰，躬崇简朴，而大小臣工、未能仰体，尚竞为奢华，横取罔用，全不思西北亢旱，东南水灾。天下百姓，方有饥寒穷苦之患，臣愚以今日戒飭诸臣共图安治者，无如节俭。夫八旗者，国家之根本也，披甲究丁，衣食不给。而大家臣族，婚娶则多用锦绣金珠，死丧则烧毁珍宝车马，嫁一女可破中人数十家之产，送一死可罄生人数十年之用，暴殄天物，莫可计算。至若汉宫谒选，则揭债京师，莅任有馈遗督抚。鲜衣骏马，毕侈相高，舞女歌儿，奢淫相尚。未到地方，先筹利藪，以充官用，固成必贪之势。试观今日之池馆园亭，歌舞宴会，视顺治初年，不止数倍。此等财务，何从得来。非舞弄国法而多纳赃私，即酷虐小民，而巧通贿赂。一家之锦衣玉食，一路之卖男鬻女也。虽征贪罪在不赦，而彼通于费用，走死地如鹜矣。近者会议官员服饰，奉有禁止太过之旨。在皇上宽于用法，无非使人易遵之意，实则奢

侈已论于骨髓。僭越反视为故常。若非严立法程，谁肯改弦易辙。伏祈敕下诸王大臣再加酌议。凡官员有房舍中中踰制，严以没入之条，报饰僭拟者，处以降革之例。一切婚葬，皆严限等级，不许过度。如此则官省一分之费用，民即省一分之诛求，朝廷即存一分之法度矣。如各处镇定王公将军，朝廷之心膂也，建牙树纛，岁费饷银不下千有余万。往者酌行节省，或议兵屯，或议裁汰，究竟兵难多裁，屯难聚举，协饷稍迟，即扰兵匮。惟有各藩镇力行俭约，俾营伍充实，兵力有余，始克建威。乃王公将军，势处崇高，糜费难省，而子弟亲属，尚竞豪华。或广集优伶，或多置台榭，用尤不赀。论催饷或似甚穷，而视糜费，又似甚富。臣思各藩镇额设俸禄有限，近又不许与民争利，禁止贸易，财用益无所出。若再多侈费，则将军之甲第珍奇，皆士卒之刍粮膏血也。藩镇为动旧老成，当以封疆为休戚，其以财而徒纵子弟之淫乐，何如以财而厚资士马之饱腾。伏祈敕下各省王公将军，凡车服宅舍，各遵规制，一切优妓亭台，采各省置造别地者，严行查禁。不惟克己厚军，可与士卒同甘苦，抑且养廉率属，可为国家杜浮冒矣。今天下大患，实由于文臣剥民以奉己，武臣剋兵以肥家。故莫如严立制防，尽归朴俭。图治之源，无切于此。抑臣有请焉，古之圣王卑宫室，恶衣服，身示撙节，感功臣民也。况今水旱荐臻，臣愿皇上益修恭俭，为天下先。减田猎之费，酌土木之工。江浙三织造，量行归并，期于省事省官。内库各项本色，量行改折，归于缓征缓解。一切度支，力追祖宗淳朴之风，俾天下晓然。知皇上节爱至意，大小臣工，痛加改悔，以奢侈不烦刑制法禁，而回心问道。将见治并唐虞，而嘉祥可立致也。

康熙二十四年，圣祖谕大学士等曰：“服色久经定例禁止，近见习俗奢靡，服用僭滥，皆由所司各官，视为具文，并未实心稽察，以致不遵定例。嗣后必切实奉行，时加申饬，务期返朴还淳，恪循法制，以副朕敦本务实，崇尚节俭之意。

是年，圣祖又谕掌膳等官曰：天下之物力有限，当为天下惜之，今酥油乳酒供给有余，尔等会同庆丰可酌量收取，足用则已，不可过多。蒙古甚穷乏，取者减少，则彼贫人日用，可以恒足矣。三十三年，户部题乌喇解送貂鼠缺额，应将该管官议罪，圣祖曰：数年来因捕貂者众，故不足额，以此议处，是无辜获罪。若不得佳者，朕但少御一裘，何关紧要。且貂价其贵，而又非必用之物，朕亦不甚需之。

康熙三十九年，圣祖谕大学士等曰：给事中穆和伦条奏服用奢侈本章，尔等拟票申饬，朕意言官专任耳目之职，若图言而罪之，谁复敢言。但此本内容顺治以来至康熙十年，尚为俭朴，自后渐至奢僭等语，殊属错谬。朕知之甚悉。自辅臣摄政十年以前，凡器用服食等物，甚为奢侈，自朕听政以来，一应服食，俱从节俭，诸王大臣亦皆效法，不用金银器皿金镫等物，此时服用较从前十分之内，已减九分矣。然笔贴式护军庶人等服用，未必不少有奢侈，朕岁岁赏赉，更给官马，而生计尚未充裕，谓非奢侈之故乎。朕阅载籍，历代以来，皆由朴而渐至于奢，未有由奢而渐至于朴者，不可以不禁也。当此之时，惟以大开言路为要务，况设立科道，专为求言，所言当则行之，不当但将原本发还，如此则内外臣僚，亦俱知所儆戒矣。朕听政三十年，言官有为人而言者，有受贿陈奏者，有报私仇而颠倒是非者，此等条奏，朕无不知，至于丧祭时恐其僭用，朕屡经传谕族长，著不时查察，今日久渐弛，容或有之，亦当禁止，此本著不必申饬。

是年，工部奏杂项修理钱粮，圣祖曰：一月内杂项修理，即用银至三四万两，殊觉浮多，明代宫中一日万金有余。今朕交内务府总管，凡一应所用之银，一月只六七百两，并合一应赏赐之物，亦不过千金。从前光禄寺一年所用银两，亦甚浮多，朕节减大半。工部情弊甚多，自后凡有修理之处，将司官笔贴式俱奏请派出，每月支用钱粮，分析细数，造册具奏，若三数内有塌坏者，著赔修。如此则工程坚固，钱粮亦不至妄费也。

康熙四十二年，圣祖谕八旗都统前锋统领，护军统领副都统参领佐领等曰：朕为官民生计，不时虞念。前已屡施大泽，今年诏款内复特沛鸿恩，不惜数百万帑金，遍行赏赐，嗣后军卒人等，应人人务立生计，清偿逋欠，丰裕度日。尚有不肖之辈，不思撙节俭约，惟知纵酒酣饮，鲜衣肥马，过于费用，则不数日间，仍如未沛恩泽时。尔等俱有督率之责，不当徒以督率为名，亦当诱之向善，使人人以孝悌为本，各知自守，爱惜产业，则不特风俗可致淳朴，而朕惜兵之心，亦不致徒劳矣。可将此旨刊刻，编示军卒人等。受朕重恩如此，仍行赌博，行止不端，朕断不轻贷，必将为首者立正典型。朕念切兵民生计，是以亲书谕旨。钦哉。

康熙四十四年。圣祖南巡，驻跸扬州茱萸湾行宫。御制述怀诗序曰：朕每至南方，览景物雅趣，川泽秀丽者，靡不赏玩移时也。虽身居九五，东桂山水之情，与众何异，但不至旷日持久，有累居民耳。所以一日即过者，亦恐后日错借口实，而不知所以然也。至于茱萸湾行宫，乃系盐商百姓感恩之诚而建起。虽不与地方官吏，但工价不下数千。尝览汉书，文帝惜露台百金，后世称之。况为三宿，此费十倍于此乎。故作述怀近体一首以自警，又粘之壁间以示维扬之众。

康熙四十九年，九卿等议覆金都御史屠沂条陈节俭一疏。圣祖谕大学士等曰：禁止奢僭而崇尚节俭，极当于理。朕近查宫中人数，皇太后宫及朕所居正宫，不过数百人，较之明代宫人，则减省多矣。先是光禄寺供应宫中用度，每年七十万两有余，朕渐次节省，不使滥溢，一年止需七万两矣。理藩院向来每年赏赐供应外藩宾客，用银八十万两，今裁减浮费，一年止需八万两矣。户工两部，前此每年所用钱粮，其数过多，今十日一次奏闻，用过数目，所需钱粮，已极少矣。朕用钱粮节省如是。因臣民僭用妄费，从前屡有禁约，今若又行禁约，徒有法令滋繁而已，究无补于事也。盖法令非不详尽，皆由臣下奉行不善而然。步军统领顺天府府尹地方该管官员，果实心遵行，何至如此乎。

圣祖崇尚勤俭；尝著勤俭论以自警，论曰：“尝观尧以执中之旨授舜，舜以执中之旨授禹，而孔子称禹日无闲然，舜以美其勤邦俭家。盖以禹之奉已简薄，而于天地祖宗生民数大事，克备夫道以至其厚，有合于中之旨焉。夫崇宫室、丰饮食、美衣服，此皆人心也，其几易溺。敬天地、孝祖宗、拯生民、此道心也，其几易怠。溺则侈，侈则嗜欲日荒。怠则逸，逸则理道日远。发于一心，见于天下，而盛衰治乱之途叛矣。傅曰：私欲宏多，则德义鲜少。德义不行，则迩者骚离，远者距违。甚言奢之不可不戒也。至书载文王卑服，即康功田功，又言自朝至于日中昃，不遑暇食，用试和万民，伊尹之告太甲曰：慎乃俭德，惟怀永图。噫，俭与勤之道尽之矣。朕检身省心，常恐弗及。故万机日御，以自砥励。而宫中府中之用，刻意损抑，较之前代，每岁所需，十不及一。虽不敢以于大禹文王之君，而兢兢勿侈勿逸之念，恒欲化雕返朴，祛肆崇敬，以务几道乎。忽人心危而道心微。苟侈泰之心，

中于几微，势必形于国家，其弊有不可遏者。则慎修思永，尤执中之要道也欤。

圣祖庭训曰：朕此居殿，见铺氍毹等物，殆及三四十年而未便换者有之，朕生性廉洁，不欲奢于用度也。

训曰：民生本务在勤，勤则不匮。一夫不耕，或受之饥，一妇不织，或受之寒，是勤可以免饥寒也。至于人生衣食财禄，皆有定数，若俭约不贪，则可以养祖，亦可以致寿。若夫为官者俭，则可以养廉，居官居乡，只缘不俭。宅舍欲美，妻妾欲奉，仆隶欲多，交游欲广，不贪何从给之。与其寡廉，孰若寡欲。语云俭以成廉，侈以成贪，此乃理之必然者。

训曰：古人尝言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积，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积，此先事预防之至计，所当讲求于平日者。近见小民蓄积匮乏，一遇水旱，遂致难支。比皆丰稔之年粒米狼戾，不能储备之故也。国计若是家计亦然。故凡家有田畴足以贍给者，亦当量入为出，然后用度有难，丰俭得中，安分养福；子孙常守。

训曰：老子曰知足者富，又曰知足者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，奈何世人衣不过被体，而衣千金之裘，犹以为不足。不知簞食瓢饭者，固自乐也。朕念及于此，恒自知足。虽贵为天子，衣服不过适体；富有四海，而每日常膳，除赏赐外，所用肴饌，从不兼味。此非朕勉强为之，实由天性自然。汝等见朕如此俭德，其共勉之。

训曰：世之财物，天地所生以养人者有限，人若节用，自可有余，奢用则顷刻尽耳。何处得增益耶。朕为帝王，何等物不可用，然而朕之衣服，毫无过费。所以然者，特为天地所生有限之财而惜之也。

圣祖讲筵绪论曰：国家财赋出于民，民力有限，当思樽节爱养，则国家常见其有余，每见明季诸君，奢侈无度，宫中服食及创造寺观，动到数十万，我朝崇尚朴质，较之当时仅百之一二耳。

【大意】

我朝起自东陲，尊尚朴质，历传以来，继序不忘。用能官府服御，无侈饰、无冗费，昭俭德以示子孙。

康熙曾说：当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。以此为训，不敢过也，自是恭俭相承，累代传为家法矣。

康熙八年，圣祖谕工部曰：前奉太皇太后谕，谓乾清宫交泰殿栋梁损坏，宜撤旧重建。慈命谆受，朕不敢违，但勿事华丽，令质朴坚固，以称太皇太后倦倦之意。

康熙十六年，给事中徐旭龄奏请力行节俭疏，其中说道：令天下大患，实由于文臣剥民以奉己，武臣克兵以肥家。故莫如严立制防，尽归朴俭，图治之源，无切于此。

康熙三十三年，户部题乌喇解送貂鼠缺额，应将该管官议罪。康熙却说：数年来，因捕貂者重，故不足额，以此议处，是无辜获罪。若不得佳者，朕但少御一裘，何关紧要。且貂价其贵，而又非必用之物，朕亦不甚需之。

朕阅载籍，历代以来，皆由朴而渐至于奢，未有由奢而渐之于朴者，不可以不禁也。

圣祖庭训曰：朕此居殿，见铺毡片等物，殆及三四十年而未便换者有之，朕生性廉洁，不欲奢于用度也。

训曰：民生本务在勤，勤则不匮。一夫不耕，或受之饥；一妇不织，或受之寒。是勤可以免饥寒也。至于人生衣食财禄，皆有定数，若俭约不贪，则可以养祖，亦可以致寿。若夫为官者俭，则可以养廉，居官居乡，只缘不俭。俭以成廉，侈以成贪，此乃理之必然者。

虽贵为天子，衣服不过适体；富有四海，而每日常膳，除赏赐外，所用肴馔，从不兼味。此非朕勉强用之，实由天性自然。汝等见朕如此俭德，其共勉之。

训曰：世之财物，天地所生以养人者有限，人若节用，自可有余，奢用则顷刻尽耳。何处得增益耶？朕为帝王，何等物不可用，然而朕之衣服，毫无过费，所以然者，特为天地所生有限之财而惜之也。

圣祖讲筵绪论曰：国家财赋出于人民，民力有限，当思樽节爱养，则国家常见其有余。每见明季诸君，奢侈无度，宫中服食及创造寺观，动则数十万，我朝崇尚朴质，较之当时仅百之一二耳。

